

改造運動： 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

郭秋永**

- 一、引言
- 二、學術背景
- 三、基本主張
- 四、規範轉向
- 五、質量並重
- 六、結語

改造運動（Perestroika movement）乃是當今美國政治學界中一個方興未艾的知識運動。俄文「Perestroika」一詞，反映出改造運動的兩個核心理想：致力於重建美國政治學，以及將新觀念、新參與者引入政治過程。然而，究竟如何「重建美國政治學」呢？究竟怎樣「引入新觀念和新參與者」呢？

在改造運動者看來，實現這兩個核心理想的良方妙藥，首在於大力整頓「操弄數學符號而漠視實質內涵」的美國政治研究現況，從而致力於「恢復政治哲學在政治研究中固有的核心地位」。誠然，這樣的嚴重指控與改弦易轍的主張，自然惹起一系列的激辯。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的不吝賜教，謹此敬申十二萬分謝忱，唯一切文責自負。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E-mail：cykuo@gate.sinica.edu.tw

投稿日期：2009年7月2日；接受刊登日期：2009年9月15日。

東吳政治學報/2009/第二十七卷第三期/頁1-64。

然而，這一系列的辯論重心，大都集中在「美國政治學會」的組織體系、學術期刊的編輯方針、研究生的課程安排等枝節議題，而比較缺乏「操弄數學符號」與「重視實質內涵」之間的理論性探究，或者比較缺少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之間的理論性討論，遑論這兩者之間的整合論述了。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專業組織、專業期刊、以及課程設計等的「制度改造」之外，特別從美國政治學發展史的角度，評述改造運動之「學術改造」的主要含意。

關鍵詞：改造運動、量化研究、質性研究、政治哲學、政治科學、
政治學方法論

一、引言

改造運動（Perestroika movement）乃是當今美國政治學界中一個方興未艾的知識運動。2000年10月15日，一封署名「改造先生」（Mr. Perestroika）的電子郵件，針對美國的政治研究現況、政治學術期刊、政治專業組織等，提出十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公開質問「美國政治學會」（APSA）發行的兩份期刊編輯，亦即《美國政治學評論》（*APSR*）與《政治學與政治》（*PS*）的編輯。這封隱匿真實姓名的電子郵件，原先傳送給十位政治學者，並請這十位政治學者盡可能轉寄相關人士。不久之後，改造運動的呼籲，「就像野火燎原般地迅速傳開來」（Monroe, 2005: 1），進而引起「美國政治學何去何從」的熱烈討論與激烈辯論。

「Perestroika」一詞，原是俄文。前蘇聯政治領袖 Mikhail Gorbachev（1931-）於1985年任職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時，曾經運用此一語詞，提出一系列的根本改革方針。美國政治學界的「改造先生」，深受 Gorbachev 改革蘇聯的鼓舞，因而選用「Perestroika」作為電子郵件的署名。根據 Kristen Monroe 的說明，在 Gorbachev 的用法中，「Perestroika」一詞至少計有七個不盡相同的界說。在這七個不盡相同的界說中，其中兩個界說可以十分貼切地彰顯出美國政治學界中的兩個改革熱望，因而美國改造運動者運用「Perestroika movement」來標誌美國政治學的改造要求。Monroe 說：「俄文名稱反映出改造運動的兩個核心理想：致力於重建美國政治學，以及將新觀念、新參與者引入政治過程。」（Monroe, 2005: 1, 3-4, note 2）。

那麼，究竟如何「重建美國政治學」呢？究竟怎樣「引入新觀念和新參與者」呢？依據一位著名改造運動者 Gregory Kasza (2001) 的說明，在改造運動者看來，實現這兩個核心理想的良方妙藥，首在於大力整頓「操弄數學符號而漠視實質內涵」的美國政治研究現況，從而致力於「恢復政治哲學在政治研究中固有的核心地位」（Kasza, 2001）。誠然，這樣的嚴重指控與改弦易轍的主張，自然惹起一系列的激辯。

然而，改造運動所引起的一系列激辯，大都集中在「美國政治學會」的組織體系、學術期刊的編輯方針、研究生的課程安排等枝節議題，而比較缺乏「操弄數學符號」與「重視實質內涵」之間的理論性探究，或者比較缺少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之間的理論性討論，遑論這兩者之間的整合論述了。民主理論家 John Dryzek (1953-) 就曾指出：「始於 2000 年的改造運動，雖然震動了美國政治學界，但卻缺乏方法論的豐富論證。這意味其所在爭論的，已經變成政治性的，而非知識性的……運動可能改變專業內的權力均衡，但卻使政治研究依然保留現狀而不變」（Dryzek, 2005: 509）。

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專業組織、專業期刊、以及課程設計等的「制度改造」之外，特別從美國政治學發展史的角度，評述改造運動之「學術改造」的主要含意。為了能夠達成此一目的，本文的論述，將從「學術背景」、「基本主張」、「規範轉向」、「質量並重」等層面，逐一分別進行。

二、學術背景

民主理論家 John Dryzek (2006) 曾經指出，美國的政治學，乃是

一門「先天性動盪不安」的學科（a congenitally unsettled discipline）。

依據Dryzek（2006）的見解，自從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來，美國的政治學，總共歷經了下述五次的革命性運動（revolutionary movements），從而呈現出「先天性動盪不安的」特質：十九世紀末葉的國家主義（statism）、二十世紀初葉的多元論（pluralism）、二十世紀中葉的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新政治組合（The Caucus for a New Political Science）、二十一世紀初葉的改造運動。¹

Dryzek 進一步指出，當以「再設定學科議程」作為成敗的判斷標準時，在這五次革命性的運動中，只有國家主義與行為主義，才是成功的革命性運動，其他皆屬失敗的運動。在這兩個成功的革命性運動中，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者，運用「國家」概念，設定了當時政治學的研究範圍與大學課程；二十世紀中葉的行為主義，則憑藉下述四個宗旨，在學科議程的設定上展現出龐大力量：（1）研究

1. 在〈沒有敵人的革命：政治學中的各種關鍵轉變〉一文中，Dryzek 交互使用「運動」、「革命」、「革命性運動」等術語而不加以區別。依據筆者的解讀，這些術語都指政治學之「定向概念」（concept of orientation）的更動趨勢。「定向概念」的主要作用，端在於選擇適當的研究範圍，因而政治研究之「革命性運動」的目的，便在於「重新」劃定政治研究的適當範圍。如此說來，Dryzek 所謂之「革命」的意思，異於「政治革命」。一般瞭解的「政治革命」，至少具有下述兩個特徵。第一，既有政治系統中的少數成員，不滿現行政治系統的各種施政，因而揭竿而起，企圖全盤推翻現行政治系統。第二，在革命過程之中，政治系統中的菁英份子，分成兩個敵對陣營；其中一個陣營的宗旨，乃在維護既有的政治系統，另外一個陣營的宗旨，則在於推翻既有的政治系統；而推翻既有政治系統所使用的手段，乃是既有政治系統所禁止的各種非法方式。至於 Dryzek 所謂的「革命」，則指「劃定政治學科的研究範圍」的運動，或指「設定學科的議題」的運動。因此，Dryzek 方才一再宣稱「成功的革命性運動」的關鍵因素，端在於該革命性運動「在學科之內沒有敵人」，或者「敵人是在成功之後方才出現」（Dryzek, 2006: 487）。顯而易見的，在革命過程之中「沒有敵人」或「敵人是在革命成功之後方才出現」的說法，異於一般瞭解的「政治革命」意思。

焦點集中在政治行為上；（2）力求科學的方法論；（3）在政治立場上擁護自由主義的多元論（liberal pluralism）；（4）以「政治系統」作為一個組織性的概念。

依據筆者的淺見，這一門「先天性動盪不安的」學科，與其說是隨著五次革命性運動而呈現出波濤起伏的特質，不如說是隨著「科學化主張」的強弱程度而顯現出起伏不定的波動特質。

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者，將「業餘的」政治論述，成功地轉成「專業的」政治分析，使得政治研究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從而起步邁向「科學研究」的道路。二十世紀初葉的多元論，旨在對抗「一元論國家」（monistic state），其所關注的課題，乃是規範性的研究，而非經驗性的科學研究。二十世紀中葉行為主義之「力求科學的方法論」的宗旨，在設定學科議程上，確實發揮極大的主宰作用。即使時至今日，當「政治行為」、「自由主義的多元論」、以及「政治系統」等宗旨的影響力道，已經呈現出力疲之勢時，「力求科學的方法論」這一宗旨的影響力，依然如同往昔，儘管異議之聲也時有所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新政治組合，旨在反對政治研究的「科學化」。二十一世紀初葉的改造運動，更是高聲反對「硬科學」（hard science）。²

2. 此處所謂的「硬科學」，乃指「操弄數學符號」的理性選擇理論、形式模型建構、以及量化研究等的「科學研究」，不同於《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內「社會科學」這一詞條中之「硬科學」的用法。依據該詞條的說明，自然科學已經成功地運用了「科學方法」而產生許多「全稱定律」，從而具有高度準確的預測力。社會科學雖然也在運用「科學方法」，但在「全稱定律」的探究上，顯得步履維艱。兩相對照之下，自然科學是「硬科學」，而社會科學則是「軟科學」（soft science）：社會現象的科學研究，至今仍是一種軟趴趴而尚待奮起的科學活動（Kerr, 2008: 614）。據此而言，社會科學常被稱為「軟科學」的理由，大體上約有下述兩個。第一個理由是，比起自然科學來，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乃是一種會隨不同時空而變動的「軟體」，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輕易操控的、能夠精確測

如此說來，Dryzek 所謂之五次革命性運動的波濤起伏，可以比較單純地視作「科學化主張」的消長變動。美國政治學家 Rogers Smith 也曾指出：「在政治學的歷史中，最久遠、最激烈、最不休止的爭論課題，莫過於政治研究能否完全成為唯一門『科學』的問題。假使能夠完全成為一門『科學』，那麼適於政治研究的方法，究竟是什麼呢？」（Smith, 2005: 525）。因此，我們可從美國政治學之「科學化主張」的演化趨勢，探究改造運動的學術意涵。

自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葉，美國政治學者大體上採取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approach）、制度研究法（institutional approach）、規範研究法（normative approach）等三種研究法，從而將其研究焦點，集中在政治思想、政府體制、倫理學、以及政治制度的歷史演變與法律規定。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謂的「研究法」（approach），不同於一般所說的「方法」（method）。一般所說的「方法」，乃指收集資料與處理資料的技術。收集資料的技術，包含問卷法、訪問法、實驗法、參與觀察法等等，而處理資料的技術，則包括各種統計方法與電腦模擬法。至於所謂的「研究法」，則指選擇問題與資料的準則。這種意義之下的「研究法」，旨在建立一個組織性的概念（an organizing concept）或一套概念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以期確定研究方向，並彙整各種資料（Isaak, 1985: 185-192）。

如此說來，採取歷史研究法的政治學者，就在於將「歷史」當作政治研究的一個組織性的概念，從而堅信「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的歷史」，或者從而深信「政治學而無歷史學，猶有樹而無根；歷史學而無政治學，猶有花而無果」，因而致力於特定時

量的「硬體」。第二個理由是，比起自然科學來，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缺乏鐵證如山而硬梆梆的「全稱定律」或「統計定律」。

期之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的歷史研究，例如美國憲法史或中世紀政治思想史的探究。採用制度研究法的政治學者，乃在於將「制度」當作政治研究的一個組織性的概念，從而相信「若要改善政治生活，則必先改變政治制度」，或者從而認定「政治學即是憲法與制度之學」，因而根據憲法條文與官方記錄，針對政府機關及其行政程序，進行分析並提出改善建議，例如三權分立或聯邦政府的制度解析。採行規範研究法的政治學者，乃在於將某種「普遍道德」當作政治研究的一個組織性的概念，從而深信政治生活中一定存在著「最佳政府體制」，而足以實現國家的目的，並且能將普遍性的道德原則，體現在政治生活中，正如數學上一定存在著三角形的絕對標準，而足以校正實際上手畫之不盡完美的三角形（例如手畫三角形的三條邊線，往往不會很直，而其三角之和，通常也不會正好等於一百八十度）。這類政治學者的著作，基本上關注某一「最佳政府體制」，從而探討權利、義務、自由、平等、正義等議題。

誠然，這三種風行一時的研究法，非但不是彼此互斥的，反而是相輔相成的。因此，在這個時期中，同一篇文章或同一本書的政治著作，未必只是採取某一種研究法的成果表現，而很有可能是採用多種研究法的績效呈現。

無論如何，這個時期的政治研究，不管採取哪一種或哪幾種研究法，基本上顯現出兩大特色。第一，這三種研究法根本就是「圖書館式的」研究法。政治研究者只要長期「窩在」書房內（或圖書館中）遍覽群書、翻閱歷史檔案、熟讀法令條文、檢視政府公文、查閱民間文件，就可選定題材以期進行精細的探索研究，而不必透過調查法之類的經驗方法去檢視真實的政治生活。第二，這三種「圖書館式的」研究法，截然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科學方法」，無論當

時政治學者如何詮釋自然科學的「科學方法」。因此，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政治學者，對於政治研究的「科學化」，疑惑橫生，甚至公然駁斥。例如「美國政治學會」第四任會長（1907-1908）James Bryce（1838-1922），不但懷疑政治研究可以近似氣象研究的見解，而且斷定政治研究永無「科學化」的可能性。他說：「政治學可以達成的『確定性』，永遠不會大過歷史學，而歷史學永不能成為科學。因為人類現象可被描述，但不能像自然現象那樣被計算與度量」。³再如「美國政治學會」第六任會長（1919-1910）Woodrow Wilson（1856-1924），深信政治關係乃是理解的題材，而非科學的材料，因此公開反對「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這一名詞，進而呼籲學界改用「政治」（politics）一詞。

誠然，在這段時期中，仍然有一些政治學者力圖政治研究的「科學化」。例如「美國政治學會」第五任會長（1908-1909）Abbott Lowell（1856-1943）就曾呼籲政治研究者不應全神貫注於「應該發生什麼」而完全不顧「實際上究竟發生什麼」，進而要求政治研究者廣泛使用統計方法，因為統計方法乃是「發現新事實」與「檢定事實」的無價工具。再如「美國政治學會」第十二任會長（1915-1916）Jesse Macy（1842-1919）更是要求政治研究者放棄「尖酸刻薄的言辭辯論」，轉而運用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而來探究實際運行的美國聯邦制度。次如「美國政治學會」第十四任會長（1917-1918）Henry Ford（1851-1925），雖然認為政治研究在本質上屬於「歷史性的與描述性的」，但卻認為政治研究能夠發展出一些具有預測力的「普遍應

3. 本節簡述 Woodrow Wilson、James Bryce、Abbott Lowell、Jesse Macy、Henry Ford、Arthur Bentley、George Catlin、Charles Merriam、William Elliott、Edward Corwin、Charles Beard 等著名政治學家的見解。基本上參見 Somit and Tanenhaus (1967: 29、73-74、78-79、87-88、114-115、117-122)。

用原則」，終將會變成「真正的科學」。又如著名政治學者 Arthur Bentley (1870-1957)，不但鼓吹政治現象的量化研究，而且深信政治研究可以達到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程度。大體而言，不論這些「科學化主張」是否言之成理，在乏人問津的大勢之下，終歸曲高和寡而難成氣候。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之後，政治研究的「科學化」，漸從不了了之的個別呼籲，慢慢轉變成群策群力的集體反思，從而埋下兩軍對壘的地雷。這種集體的反思，不但顯現在三次的全國性學術研討會，而且呈現在一些廣被閱讀的政治名著中。

在「美國政治學會」第二十任會長（1924-1925）Charles Merriam（1874-1953）的籌備下，美國政治學界曾以「政治的科學」（science of politics）為題，針對政治研究的基本目的與方法，分別於 1923 年、1924 年、及 1925 年，舉行三次的全國性學術研討會，從而使得「科學化」議題逐漸落地生根。Merriam 並於 1925 年出版《政治學的新面向》（*New Aspects of Politics*）一書，一方面呼籲政治學者放棄老舊的研究法，另一方面則建議「政治的新科學」（new science of politics），暢談「科學化」乃是政治研究的新方向（Merriam, 1925）。除此之外，自詡為「政治實驗科學家」（political experimental scientist）的著名政治學者 George Catlin（1896-1979），更於 1927 年出版一本廣被閱讀的著作《政治的科學與方法》（*Science and Method of Politics*），不但力主一種不受價值左右而又具有預測力的「科學的政治學」（scientific politics），而且針對各種反對「科學化」的流行見解，運用相當篇幅一一加以駁斥（Catlin, 1927）。

然而，這些「科學化」的主張，尤其是「價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 的呼籲，立即招致一些嚴厲的批評。例如，著名政治學者 William Elliott (1896-1979) 就曾反擊說，所謂的「政治的科學研究」(scientific studies in politics)，雖然號稱研究者可以排除價值而不受價值的左右，但在其研究過程中卻常毫無批判性地偷偷引入價值，甚至硬將價值當作事實(Somit and Tanenhaus, 1967: 118)。再如，「美國政治學會」第二十一任會長(1925-1926) Charles Beard (1874-1948)，不但排除「價值中立」的可能性，而且認定「價值中立」乃是荒誕不經的觀念，進而鐵口直斷說：「沒有價值，哪有偉大的政治著作呢？」(Somit and Tanenhaus, 1967: 121)。

綜合上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數十年中，美國政治學界中的「科學化主張」，雖然激起陣陣的漣漪，但絕非學術主流，而正、反雙方的「科學化」論戰，也是零星的交火，而非全面性的火拼。筆者的這個論點，事實上可從「美國政治學會」發行之《美國政治學評論》所登載的論文，多多少少獲得某一程度的印證。根據 Somit and Tanenhaus (1967: 122, 128) 的統計，於《美國政治學評論》登載的論文數目中，被歸類為「科學取向」的論文，在 1921-1925 年，有 7.3% 篇的論文，在 1926-1930 年，有 13.7% 篇的論文，在 1931-1935 年，則有 9.5%；而被歸類為「科學主義」的正、反雙方的辯論文章，在 1921-1932 年，幾乎每期都有一些零星討論，但在 1933-1940 年，雙方都偃旗息鼓而使得此類辯論文章完全銷聲匿跡。顯然的，從這三個百分比及正反雙方的辯論文章數字看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數十年中，美國政治學界中的「科學化主張」，絕非學術主流。

然而，這樣的趨勢，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產生變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9-1945)，許多美國政治學者曾被政府徵召，擔

任政府要職而參與不少的重要決策。可是，這些「學而優則仕」的政治學者，在參與戰時決策的過程中，卻發現他們分從歷史研究法、制度研究法、規範研究法等三種「圖書館式的研究法」所獲得的政治知識，根本脫離世界各國的實際政治生活而無濟於事：既不足以精確掌握「西方諸國」的政治現況，又不能真確描述「非西方各國」的政治生活，遑論更重要的解釋與預測的課題了。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研究法的改弦更張，也就成為當務之急。

1945年，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特別設立「政治行為委員會」(Committee on Political Behavior)，大力推動政治行為的科學研究。這個推動惹起了一些爭議。1946年，在《美國政治學評論》上，政治學者之間再次掀起一場「科學化」的筆戰，雙方針對「非規範性的政治科學」(a non-normative political science)的議題，各就「是否可能」與「是否可欲」的角度，進行激烈的辯論。在這個辯論之後，政治行為的科學研究，逐漸獲得重視，而「圖書館式的研究法」的光彩，則日漸消散。1948年，美國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開辦一個暑期訓練班，專門教導統計分析與調查方法。這個暑期訓練班甫成立，立即獲得美國政治研究者(美國各大學的政治學系所教師與研究生)的熱烈響應，從此年年舉辦直至今日，十分有助於推進政治研究的「科學化」。

在「政治行為委員會」以及民間基金會的財務資助之下，日益熟諳統計分析與調查方法的政治學者，毅然放棄傳統的「圖書館式的研究法」，從而改採新的研究法。這個新興的研究法，便是政治研究者耳熟能詳的行為研究法(behavioral approach)。在行為研究法的引導下，政治學者選擇問題與收集資料的準則，已從歷史、制

度、法律、以及道德規範等層面，轉向政治行為者及其行為；而其分析資料的技術，則從單純的敘述、類比、及比較等文字敘述，轉成統計分析的數量描述與數學推論。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歐陸一些著名的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紛紛逃離納粹勢力、遠渡重洋避居美國。這些久享盛名的學者，在移居美國後，便將歐陸的一些重要學說，一一引入美國學術界。在這些新近引入的歐陸學說中，最能契合美國政治學界之行為研究法的，莫過於一向強調「科學研究」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⁴ 在結合美國本土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運作主義（operationalism）之後，邏輯實證論便為新興的行為研究法，奠定一個鞏固的哲學基礎。因此，美國政治學術界中的行為研究法，實際上已非單純的研究法；它包含著許多「科學化」的觀點，從而常被稱為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

如同其他各種的「主義」，「行為主義」這一術語也乏人人贊同的一致內涵。不過，在眾說紛紜的各種說明之中，最常被引用的詮釋，約略計有政治學者 Evron Kirkpatrick（1911-1995）、著名行為主義者 David Easton（1917-）、以及兩位美國政治學史專家 Albert Somit 與 Joseph Tanenhaus 等三種論述。Evron Kirkpatrick 認為行為主義具有下述四大特徵：（1）政治分析的基本單元，乃是「個人行為」，而非傳統上的政治制度；（2）政治科學應該藉助統一的標準與方法，而跟行為科學中的其他學門，進行科際整合；（3）發展出更精確的觀察、分類、及測量的技術，盡可能使用統計與量化的方法；（4）政治科學的首要目標，端在於建立有系統性的、經驗性的政治理論

4. 關於「邏輯實證論」與「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之間的差別，請見郭秋永（2002：468）。

(Kirkpatrick, 1962)。榮任「美國政治學會」第六十四任會長 (1968-1969) 的著名行為主義者 David Easton，曾經列出行為主義的八大信條：行為規律性、檢證原則、發展技術、精確量化、區分倫理性的評價與經驗性的解釋、系統化的知識、純科學、科際整合等八大信條 (Easton, 1965: 7)。兩位美國政治學史專家 Albert Somit 與 Joseph Tanenhaus 也曾列出不盡相同的八大信條：力圖成為可預測與可解釋的科學、主要探究可觀察的政治現象、資料的量化要求、理論引導研究、放棄應用研究、不研究價值的真偽、科際整合、更加運用多變數分析、抽樣調查、數學模型及模擬等工具 (Somit and Tanenhaus, 1967: 177-179)。據此而言，不論是四大特徵或是八大信條，「科學化主張」乃是行為主義的根本宗旨。

1950 年代，追求「科學化」的行為主義者，尤其是「芝加哥學派」的政治學者，出版了一系列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政治論著。在這些眾人爭相閱讀的論著中，David Truman (1951) 的《政府過程》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一書，更被政治學者推崇為一把開啟「真正的政治科學」 (a real “science of politics”) 的鑰匙。David Easton (1953) 的《政治系統：政治學現狀的一個研究》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一書，則痛陳美國傳統研究法的諸多弊病，進而呼籲政治研究者迎頭趕上行為科學中其他學門的方法水準。Easton 的沈痛陳述與誠摯呼籲，博得政治學者的熱烈響應。

進一步說，在 1950 年代，一些著名的行為主義者，分別當選「美國政治學會」的會長，從而展現出行為主義已經躍居當代顯學的不爭事實：Pendleton Herring (1903-2004)、Harold Lasswell (1902-1978) 以及 Valdimer Key, Jr. (1908-1963)，分別榮任「美國政治學會」

第四十八任會長（1952-1953）、五十一任會長（1955-1956）、以及五十三任會長（1957-1958）。顯然的，時至五十年代，美國政治學界中的行為主義，已經不再如同「零零落落的遠處雷聲與閃電」，而是近在咫尺的耀眼光芒了（參見 Somit and Tanenhaus, 1967: 185、188-189）。

行為主義既然躍居美國政治學界的顯學地位，那麼當然意味原先主宰政治研究的傳統政治學（或傳統的「圖書館式的研究法」）已經喪失支配優勢。在 195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初期，這些喪失優勢的傳統政治學者，針對行為主義的「科學化主張」，發動了一連串的猛烈反撲，從而被稱為「反行為主義者」(anti-behavioralist)。

在這一連串的反撲中，比較值得注意的，乃是 1962 年幾位著名「反行為主義者」集結出版的《縱論政治科學研究》(Storing, 1962)。在這本充滿高度批判性的論文集集中，「反行為主義者」針對行為主義者洋洋得意的、風行一時的幾個科學研究成果，亦即投票研究、行政研究、團體研究、宣傳研究等四個次級領域的科學研究成果，進行徹頭徹尾的詳細檢視。在逐一檢視之後，這些「反行為主義者」所得到的一個共同批判論點，便是這四種「科學研究成果」實屬本末倒置而荒腔走板的著作。換句話說，自這些「反行為主義者」看來，行為主義者的科學研究，實際上是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行為，也就是以研究「非人」的方式來研究人類，或是以研究「非政治」的方式來研究政治；據此而得的研究成果，當然注定「本末倒置而荒腔走板」。

「反行為主義者」的這個共同批判論點，充分展現在其主帥 Leo Strauss（1899-1973）的一個比喻上。「反行為主義者」的主帥 Leo Strauss，在《縱論政治科學研究》一書第五章「結論」的結尾，引

用古羅馬帝國暴君尼祿（Nero）焚燒羅馬城的故事，大大地奚落了行為主義一番。西元 64 年 7 月 17 日，羅馬帝國的羅馬城，發生一場竄燒六天七夜的大火，而使得雄偉壯觀的羅馬古城，化成了一片焦土。這場大火的真正原因，雖是千古的歷史懸案，但眾人深信就是尼祿本人暗地裏親自縱火。Strauss 借用這個故事而比喻說：「新政治科學（new political science）……不是尼祿式的政治科學。然而，我們可以這樣說它：當羅馬陷入火海時，它還在拉提琴。我們可藉兩件事實來寬恕它：它不知道它在拉提琴，它也不知道羅馬正在焚燒」（Strauss, 1962: 327）。對於這個比喻式的尖銳評論，行為主義者痛斥為「狂熱式的邪惡批評」；而 Strauss 也以「狂熱主義」與「惡意曲解」的刻薄言論，不甘示弱地再加以迎頭痛擊（Bond, 2007: 897）。

然而，無論誰是誰非，「反行為主義者」的猛烈反撲，實際上未能稍稍減緩行為主義者勇往直前的飛奔速度。時至六十年代，行為主義已是如日中天的主宰學說。這種君臨天下的浩大聲勢，充分呈現在六十年代的三項事實上。第一，行為主義者的著作書籍，不但多如雨後春筍，而且本本擲地有聲。其中幾本名著，更是眾人津津樂道的經典之作，即使時至今日，依然是學者必須拜讀的研究典範。例如，《美國選民》（Compbell et al., 1960）、《何人治理？一個美國城市中的民主與權力》（Dahl, 1961），以及《公民文化：五國中的政治態度與民主政治》（Almond and Verba, 1963）。第二，行為主義者所發表的期刊論文，不但品質優良，而且數量龐大。根據 Somit and Tanenhaus（1967: 191-192）的統計，在 1963 年至 1965 年，《美國政治學評論》總共刊載 104 篇論文，其中屬於行為主義性質的論文，計有 61 篇，約佔全部論文的 58.6%，而屬於傳統性質

的、非行為主義性質的、及反行為主義性質的「他類」論文，則共有 43 篇，約佔全部論文的 41.3%。第三，領導群倫的傑出政治學者，絕大多數皆是行為主義者。根據 1963 年舉行的一項調查報告，「1945 年以後對於政治研究貢獻最多」的前 10 名傑出學者中，行為主義者便佔有 7 位（Somit and Tanenhaus, 1964: 66）。依據 1975 年舉行的另一項類似的調查報告，「在 1945 年至 1960 年，貢獻最大的前三名政學家」，都是著名的行為主義者；此外，「在 1960 年至 1970 年，貢獻最大的前三名政治學家」，仍然都是著名的行為主義者（Lowi, 1985: xii）。⁵

可是，時至 1960s 年代末期，美國社會掀起一系列的反越戰、反貧窮、反核戰、反核廢料、反種族歧視、以及反性別歧視等所謂的「反文化革命運動」。這個風起雲湧的反對運動，不但在衣著樣式、婦女地位、環境保護、性行為觀念、弱勢團體、及有色種族等方面，展現出嶄新的要求或態度，而且針對既有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及經濟制度，進行一系列的廣泛挑戰，從而惹起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這對一向高唱「科學解釋」與「科學預測」的行為主義來說，如火如荼的「反文化革命運動」，不啻是當頭一大棒喝：對於陷入泥沼中的越戰、致命性的環境污染、破壞性的人口膨脹、毀滅性的核戰威脅、及日益惡化的社經弊病等重大問題，行為主義者為何預測不到？為何解釋不了？為何目瞪口呆而束手無策呢？一連串的質問，突顯出政治學者對於行為主義的高度不滿，後行為主義

5. 關於「1945 年以後對於政治研究貢獻最多」的前 10 位學者名單、「在 1945 年至 1960 年，貢獻最大的前三名政學家」名單、以及「在 1960 年至 1970 年，貢獻最大的前三名政治學家」名單，請見郭秋永（2002：485-486）。

(post-behavioralism) 也就隨之而起。⁶

「行為主義」的內涵，雖然眾說紛紜，但大體上都環繞著「科學化主張」而展開不盡相同的論述。然而，「後行為主義」的內涵，除了也是眾說紛紜之外，更有背道分馳的兩種迥異詮釋。依據筆者的淺見，最足以代表第一種詮釋的論述，乃是David Easton就任「美國政治學會」第六十四任會長的「演說詞」及其後續之進一步澄清的兩篇文章（Easton, 1971; 1991）。⁷ 最能夠代表第二種詮釋的著

6. 國內兩位著名的政治學家郭仁孚教授與華力進教授，都曾將「post-behavioralism」翻譯為「超行為主義」。郭仁孚教授如此翻譯的理由，主要在於其所謂的「post-behavioralism」，超越「行為主義與反行為主義之間的爭論」，而另外獨樹一幟（郭仁孚，1973：83）。可惜，郭仁孚教授並未論述「post-behavioralism」為何能夠超越「行為主義與反行為主義之間的爭論」的道理。華力進教授不但將「post-behavioralism」翻譯為「超行為主義」，而且特別指出「後行為主義」的翻譯，乃是不適當的翻譯。他說：「有人譯為『後行為主義』，筆者認為『post』譯為『後』易誤為『後期』之意，故譯為『超』」（華力進，1980：126）。依據筆者的詳細拜讀，華力進教授一方面完全根據Easton〈政治學中的新革命〉一文中的七項「相干信條」，而來說明「post-behavioralism」的基本主張（華力進，1980：110-136），另一方面卻質疑Easton文中的一些引申或補充說明，甚至逕行斷定「實在不無問題」或「實在有欠中肯」或「即使不能視為矛盾，至少是未能自圓其說」（華力進，1980：119、120、131）。這就是說，華教授一方面將其所謂的「超行為主義」的說明，奠基在Easton的論述上，另一方面卻反過來一再指摘Easton論述的不當，因而使得華教授的評述，多少顯露出一些任意性質。綜合上述，在「post-behavioralism」的翻譯上，筆者不尾隨這兩位學術先進。筆者將「post-behavioralism」翻譯為「後行為主義」的主要道理，請見郭秋永（2002：497-498）。

7. David Easton的「會長就職演說詞」（〈政治學中的新革命〉，“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發表於《美國政治學評論》（Easton, 1969: 1051-1061.），後來收錄在其所著之第二版的《政治系統：政治學現狀的一個研究》一書中（Easton, 1971）。然而，這篇「會長就職演說詞」雖屬人人爭相閱讀的大作，但也惹起不盡相同的解讀。為了澄清其中的真正意涵，Easton再寫一篇後續性質的論文（〈政治分析的延續性〉，“Continuities in Political Analysis: Behavioralism and Post-Behavioralism”），期能進一步說明其「會長就職演說詞」中所蘊含的重要主張。這一篇後續論文，也收錄在第二版的《政治系統：政治學現狀的一個研究》一書中。關於Easton所詮釋之「後行為主義」的詳細評述，請見郭秋永（2002：497-506）。

作，則是Eugene Miller（1935-）的論文及其答辯文章（Miller，1972a；1972b）。

根據 Easton 的詮釋，後行為主義者雖然高度不滿行為主義的研究績效，但卻未放棄行為主義一再強調的「科學化主張」，只是額外提出「相干與行動」的七項信條，以期針對行為主義的研究績效，進行自我反省的工作。這就是說，在 Easton 看來，後行為主義僅是一種「知識趨勢」，而不是在「科學方法」上另起爐灶以便對抗行為主義的一個嶄新學派。

然而，按照 Miller 的詮釋，後行為主義實際上深受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影響，從而極力反對行為主義的「科學化主張」。Miller 所謂的「歷史主義」，基本上包含下述三項主張：（1）知識真理的相對性；（2）人類心智的歷史性；（3）毫無「純粹感官資料」的直接理解。基於這三項主張，Miller 認為 Easton 對於後行為主義的詮釋，違犯了兩大錯誤。第一個大錯誤乃指，Easton 將行為主義與後行主義之間的差異，錯誤地詮釋為「僅是心態上的差別」或「只是相同科學觀念的不同強調」。第二個大錯誤則指，Easton 低估當代政治學者力圖恢復政治哲學的重要性與活力。簡單說，在 Miller 看來，後行為主義的宗旨，端在於反對行為主義的「科學化主張」。

由於 Miller 的詮釋理路，完全脫離「科學化」的進程，從而直接攻訐行為主義的核心主張，因此立即引起行為主義者的一連串反擊，尤其是一些著名社會科學哲學家的猛烈駁斥。這些贊成行為主義的著名社會科學哲學家，分從客觀性、理論性質、定律效力、意義論述、以及科學哲學的發展狀況等不同層面，駁斥 Miller 的歷史主義。面對四面八方的反擊，Miller 也不甘示弱地一一加以回應。

這些互相攻防的尖銳論述，都收錄在 1972 年 9 月出版的《美國政治學評論》中，從而構成政治研究領域上「科學大戰」的一個重要專刊。

在這個「科學大戰」之後，有些政治學者試圖立足高處而提出一種整合雙方歧見的見解，期望突破壁壘分明的對峙局面。在這些稍嫌零散的各種整合見解中，最有系統而備受矚目的，莫過於 J. Donald Moon 於 1975 年發表的論文〈政治研究的邏輯：對立見解的綜合觀〉（Moon, 1975: 131-228）。在這篇長達近百頁的大作中，Moon 首先依據不同的「解釋」概念，將雙方的論述，區分成為「科學模型」（scientific model）與「闡釋模型」（interpretive model）；其次提出一個「人之模型」（model of man），試圖在「科學模型」與「闡釋模型」之間進行一個整合工作。⁸

依據 Moon 的說明，「科學模型」的主旨，乃在根據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原則，而來引導社會現象的經驗研究，從而主張「涵蓋定律模型」（covering-law model）的解釋型式，亦即主張某一社會現象的正確解釋，必須憑藉某一先行建立起來的「全稱定律」（universal law）或「普遍定律」（general law）。「闡釋模型」的主旨，則力主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迥異於自然科學，進而主張闡釋性的解釋型式，也就是主張某一社會現象的正確解釋，必須訴諸社會行動的意義及其社會觀念。在深入解析這兩個模型的精義與困境之後，Moon 提出一個「人之模型」，試圖使得「科學模型」中一向強調的行動

8. 在 Moon (1975) 的用語中，「科學模型」、「自然主義模型」（naturalist model）、以及「實證主義模型」（positivist model）等三個術語，乃是不同名稱的同義詞。在 1982 年的著作中，Moon 將「科學模型」與「闡釋模型」，改稱為「理論模型」（theoretical model）與「意圖模型」（intentional model）（Moon, 1982）；在 1994 年的著作中，則改稱為「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humanism）（Fay and Moon, 1994）。

規律性 (regularity) 與「闡釋模型」中素所著重的構成意義 (constitutive meaning)，在理性選擇的共同架構內進行一個密切的整合工程。

Moon 的整合工程，雖然備受矚目，但卻乏人響應；十五年之後，更被著名政治學家 Gabriel Almond (1911-2002) 全盤否定。曾任「美國政治學會」第六十一任會長 (1965-1966) 的 Almond，在一本著作中不客氣地批評說：「其所承諾的綜合，全然跳票」(Almond, 1990: 49)。事實上，早在 1982 年，Moon 本人已經不再高唱「整合」或「綜合」之說，而悄悄改採「同時保留兩者」的策略 (Moon, 1982: 151)。

歷經七十年代的「科學大戰」以及一些零散的整合論述之後，八十年代的美國政治學界，逐漸呈現出群雄並立的多元局面：行為主義、理性選擇理論、文化分析、新國家主義、新制度論等，各盡其妙而各有千秋 (Dryzek, 2006: 491)。在這樣的多元局面下，行為主義的幾個主張的影響力道，確實已經大不如前。例如研究焦點集中在「政治行為」的主張，再如要以「政治系統」作為一個組織性概念的主張，都已呈現疲態之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行為主義的幾個主張已經逐漸喪失吸引力，但其「科學化主張」依然屹立如昔。這個並未遭受重大挑戰的「科學化主張」，在九十年代，透過「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與「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之間的整合論述，再度引吭高歌而備受矚目。⁹

9. 在台灣的社會科學界中，「quantitative research」術語的中文翻譯，計有「量化研究」與「定量研究」兩種，但其中最常用的翻譯則為「量化研究」。儘管此一英文術語中的「quantitative」，僅有「量的」而無「量化」的意思，本文大部分上仍然按照學界習慣而沿用「量化研究」一詞，但有時也用「量的研究」一詞。「qualitative research」術語的中文翻譯，則計有「質化研究」與「定性研究」等兩種；其中最常用的中文翻譯則為「質化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上，尤其在政治學的研究領域中，向來就有「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之間的區別。這個歷來就已存在的區別，常在「應否或能否科學化」的對立主張下，屢被擴大而成為「勢不兩立」的兩種秘思：量化秘思（*mystique of quantity*）與質性秘思（*mystique of quality*）（Kaplan, 1964: 172, 206）。在「量化秘思」的見解下，精確測量出研究對象的「數值」，乃是科學的首要條件，因此測量所得數字的精密計算，便是科學的內在價值，而科學的推進，往往就在於「最後小數點的精確改進」。在「質性秘思」的見解下，正確掌握到研究對象的「本質」，乃是社會研究的前提；精確計算屬於「物」的研究，而不屬於「人」的研究，因此「一旦社會研究者開始計算之時，便是開始犯錯之時」，或者「使用愈複雜、愈難瞭解的數學計算，便愈不相干、愈離題萬里」。

二十世紀末期，這兩種秘思終於面臨有系統的嚴峻挑戰。三位著名政治學者在 1994 年出版一本合著《設計社會研究：質性研究中的科學推論》（King et al., 1994），試圖在「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之間進行一個全面性的整合工作。這本全面性的整合大作，引起一系列的熱烈迴響、討論、及批評，而三位共同作者也做了一些回應。這些正、反兩面的評論與三位作者的回應，於 2004 年集結出版《再思考社會研究：分歧的工具與共享的標準》（Brady and Collier, 2004）。¹⁰

研究」。類似的，這一英文術語中的「*qualitative*」，僅有「質的」而無「質化」的意思。基於一些概念思維，本文將以「質性研究」或「質的研究」來翻譯「*qualitative research*」，從而捨棄學界最常使用的「質化研究」。中文翻譯上的一些概念思維，請見本文第（五）節（「質量並重」）。

10. 在 1996 年，政治學家 Hayward Alker（1937-2007）曾經提出一個「廣泛的科學概念」，企圖在其所謂的「闡釋與解釋之間、政策定向與科學之間、建構主義與自然主義之間」，

在 1994 年的著作中，這三位作者明確主張，「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之間，雖有風格與技術上的表面差異，但是實質上卻分享一種共同的基本推論邏輯。其所謂的「風格與技術上的表面差異」，乃指「量化研究」的進行，通常使用統計數字、數學符號、普遍性的描述、統計的假設檢定、易於重複的測量程序與分析程序等；而「質性研究」的進行，則重視個案研究、深度訪問、歷史材料、口述資料、文字論述等。至於所謂的「共同的基本推論邏輯」，則指「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的進行，都在運用相同的推論規則，從而在研究設計的各個階段上，共享相同的程序或規則，例如選擇現實生活中眾所重視而又富理論意義的研究題目、選擇最容易被否證的理論、記錄並報告資料的收集過程、盡可能收集可以觀察的資料、盡可能提高測量的效度與信度、盡可能運用資料中的全部相干信息等相同的規則或程序。

這本全面性的整合大作，雖然博得「最具影響力書籍之一」的美譽，甚至也贏得質性研究者的一些肯定，但仍然遭受到為數不少的質疑（Brady et al., 2004: 5-7）。最常見的質疑，乃是它漠視「量化研究」的一些固有限制，從而硬將「量化研究的工具，應用到質性研究的問題上，因而低估了質性研究者的方法論洞見與程序價值」（Munck, 2004: 106），或者，從而誤將「社會科學中的所有經驗研究，擠壓成為一個量化模型」（Mckeown, 2004: 140）。

這些質疑的力道，一直持續到二十一世紀。在 2000 年，一些美國政治學者開始推動「改造運動」，從而引起「未來十年希望美國政治學成為怎樣的一個學科」的廣泛討論。這些廣泛的討論，曾經

進行一個全面性的整合工作（Alker, 1996: 796-797）。然而，這個曾以一個三角形圖案而來的整合工作，略嫌簡略，也乏人問津。

收集在 2002 年 6 月出版的《政治學與政治》(*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

從本節上文的整個綜述看來，在一百餘年的演化中，「先天性動盪不安的」美國政治學，確實隨著「科學化主張」的強弱程度，而顯現出起起伏伏的波動特質。大體而言，這一連串的起伏波動，約可分成兩種交替性之互為消長的波動。第一種波動內的各個繼起波浪，分別是行為主義、Easton 詮釋下的後行為主義、以及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之間的整合論述等。第二種波動內的各個繼起波浪，分別是歷史研究法、制度研究法、規範研究法、反行為主義、Miller 詮釋下的後行為主義（包含新政治組合）、以及改造運動。就是這兩種波動的交替更迭，構成了一門環繞著「科學化主張」而起伏不定的美國政治學。顯而易見的，在「科學論題」的爭議上，美國政治科學中的紛紛擾擾，最能顯現政治科學中「科學化主張」的爭執所在，進而最能凸顯社會科學中的「科學爭議」。

三、基本主張

上文根據美國政治學一百餘年來「科學化主張」的起伏波動，而將正、反兩面的科學化主張，看成兩種交替性之互為消長的波動。透過這樣的解析，我們可以看出改造運動的歷史意義，進而探討它的基本主張。然而，在探討它的基本主張之前，我們必須澄清所謂「科學化主張」的分類問題。

誠然，本文所謂的「科學化主張」，未必能夠窮盡百餘年來各色各樣的科學化主張，也未必可以毫無疑義地將它們一一劃歸入這個類別之中。同樣的，所謂的「反科學化主張」，未必能夠窮盡百

餘年來各色各樣的反科學化主張，也未必可以毫無疑義地將它們一一劃歸入這個類別之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科學化主張」這個類別內各個次級主張所具有的性質，乃是著名英國哲學家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 所謂的「家族類似性」(family resemblance)，而不是「同質性」(homogeneousness)。同樣的，「反科學化主張」這個類別內各色各樣的次級主張，也是具有「家族類似性」，但不具有「同質性」。

一般而言，各種相關事物或人事的適當分類，必須符合「互斥」與「窮盡」兩個標準。例如若將公民的教育程度，分成高、中、低等三種程度，那麼「互斥」的標準，是指某一位公民（例如張三）之教育程度的歸類，不得同時跨越不同類別（例如張三的教育程度，不得既屬於高教育程度又屬於低教育程度）；「窮盡」的標準，則指全部公民皆可劃歸於這三種教育程度中的某一教育程度，全然不會發生無法歸類之事（例如，不會發生「張三的教育程度既不屬於高教育程度、也不屬於中教育程度、又不屬於低教育程度」之事）。在這樣的分類觀念下，同一個次級類別（例如高教育程度）內的各個組成份子（例如張三、李四、以及王五等）都具有「同質性」（例如都有大學以上的文憑）。

「家族類似性」的觀念，來自 Wittgenstein 的語言哲學。Wittgenstein 曾將語言比喻為球類、牌類、棋類、賽車、田徑運動……等等的遊戲 (game)。在這些遊戲中，我們只能看到相似點 (similarities) 與關連性 (relationship)，而找不到「全體的共同點」(common to all)。這就是說，有些遊戲（如籃球比賽）角逐勝負，但有些遊戲（如兒童拿球往牆上擲，然後接住，再往牆上擲）則不

計輸贏；有些遊戲（如馬拉松賽跑）憑靠體力，但有些遊戲（如下象棋）則賴思維；有些遊戲（如橋牌）要求高度的技巧，但有些遊戲（如檢紅點的牌戲）則靠運氣；有些遊戲（如排球賽）有對手，但有些遊戲（如單人紙牌戲）則無對手。所有的遊戲，雖有「相似點」與「關連性」，例如有勝負、有對手、靠體力、要求技巧……等，但找不出遊戲的「全體的共同點」。簡單說，「遊戲」這一類別內的各個次級遊戲，在某幾點上相似，但在其他點上可能不相似，從而構成一個重疊交錯的相似群。這種重疊交錯的相似群，正如「家族類似性」一樣。家族成員間的各種特徵，例如體形、面貌、脾氣等，也以相似方式而交錯重疊。

按照上一節的考察，一百餘年來，美國政治學中正、反兩面的「科學化主張」，確實展現出兩種「家族」的兩種「家族類似性」。第一種的「家族」，旨在主張政治研究的「科學化」，而歷年來所宣揚的各種科學化主張，則呈現出不盡相同、但又不盡相異的「家族類似性」。下述各色各樣的說法，就是上節曾經敘述過而呈現出「家族類似性」的各種科學化主張：「應該發生什麼」的判斷，完全不同於「實際上究竟發生什麼」的判斷；統計分法乃是「發現新事實」與「檢定事實」的無價工具；應該進行一種不受價值左右而又具有預測力的政治研究；必須區分倫理性的評價與經驗性的解釋；力圖成為可預測與可解釋的政治科學；探究可觀察的政治現象；盡量使用量化資料；不去斷定價值判斷的真偽；運用多變數分析、抽樣調查、數學模型、及電腦模擬等工具。事實上，第一種「家族」的「家族類似性」，也顯現在上一節引述過之各種不盡相同、但又不盡相異之「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的名稱：「政治的科學」（science of politics）、「政治的新科學」（new science of politics）、

「科學的政治學」(scientific politics)、「政治的科學研究」(scientific studies in politics)、「科學的政治研究」(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真正的政治科學」(real science of politics)、「新政治科學」(new political science)……等等。

至於第二種的「家族」，旨在反對科學化主張，而歷年來針對不同時期之科學化主張所分別提出的各種批判論述，也呈現出不盡相同、但又不盡相異的「家族類似性」。下述各色各樣的說法，就是上節曾經敘述過而呈現出「家族類似性」的各種反科學化主張：政治研究不可能近似氣象研究；政治研究毫無科學化的可能性；政治學可以達成的「確定性」永遠不會大過歷史學；人類現象可被描述但不能像自然現象那樣被計算與度量；政治關係乃是理解的題材而非科學的材料；「價值中立」乃是荒誕不經的觀念；表面上號稱「價值中立」暗地裡卻偷偷引入價值判斷；以研究「非人」的方式來研究人類；以研究「非政治」的方式來研究政治；低估當代政治學者力圖恢復政治哲學的重要性；漠視「量化研究」的固有限制……等等。

基於這樣的分辨理路，本文將以「經驗主義」(empiricism)來稱呼第一種的「家族」，而以「闡釋主義」(interpretivism)來稱呼第二種的「家族」。經驗主義堅持「科學化主張」，闡釋主義則抱持「反科學化主張」。換句話說，經驗主義主張各種科學研究（不論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的科學研究）都具有相同的推論邏輯與證據標準，從而在下述幾個論點上，抱持或強或弱的相似見解而呈現出「家族類似性」：「價值中立」的原則，概念製作的要件，假設檢定的邏輯，因果關係的條件，「普遍定律」或「統計定律」的形式，以及「涵蓋定律模型」或「歸納統計模型」(inductive-statistical

model) 的正確性與正當性。

至於本文所謂的闡釋主義，則主張社會現象（包含政治現象）的研究，端在於理解行動意義並掌握其社會觀念或文化觀念，進而在排斥「價值中立」、「普遍定律」、「涵蓋定律模型」、「歸納統計模型」、統計方法、數學演算、實驗方法等論點上，抱持或強或弱的相似見解而呈現出「家族類似性」。

顯而易見的，反對「操弄數學符號」、從而力主「恢復政治哲學的核心地位」的改造運動，可以歸入「闡釋主義」這一家族。可是，改造運動的基本主張，究竟是什麼呢？

誠然，改造運動既然屬於一種「潮流」或「運動」，則其內涵與外延，便不易明白確定，甚至眾說紛紜而無定論。不過，改造運動者 Gregory Kasza (2001) 的說明文章，或許不失為一個頗具代表性的概觀。一位對於改造運動頗有微詞的政治學家 Peter Steinberger，曾對 Kasza (2001) 的說明文章，提出這樣的評述：「沒有理由讓我相信，這篇文章具有任何的特殊權威……我也不期望其水準會同於一般評審通過的論文。然而，大體上它沒有電子郵件（包括「改造先生」的原先郵件）中常見的鬆散與草率……縱然它是一篇簡短型式文章，但對於改造運動的核心要旨，確實提供了一個代表性的與周全性的合理概觀」（Steinberger, 2005: 548-9）。

根據 Kasza (2001) 的說明，「改造運動」的主旨，端在於反對「操弄數學符號而漠視實質內涵」的美國政治研究現況，從而力主「恢復政治哲學在政治研究中固有的核心地位」。在 Kasza (2001) 的說明中，美國政治學界中的理性選擇理論、形式模型建構、以及量化研究等操弄數學符號的「硬科學」，乃是宰制美國政治學界的霸權。這個主宰美國政治學界的霸權，在研究生的訓練課程、獎助

金的來源、工作市場的就業競爭、領導地位的學術期刊等方面，持續不斷地傳送出一個十分強烈的信息：政治研究的核心，就是數學推理與統計推論（see also Smith, 2005: 526）。

Kasza 指出，「硬科學」的霸權，已在美國政治研究領域中產生三大弊病。第一，它威脅到學術自由。Kasza（2001: 597）說：「為了迫使我們順從，有些硬科學家在雇用、升遷、及出版等的決策上肆意操縱。……在今天，硬科學竟然使得許多年輕學子深信，為了進入這個專業領域，首先必須犧牲知識的完整性。」一位自詡為改造運動者、但又自稱會被他人歸類為被改造對象的政治學者 Kristen Monroe 也坦誠指出，許多參與改造運動的年輕學者，由於害怕霸權者的報復，而不敢顯露真正的身份姓名（Monroe, 2005: 1、4; see also Kaufman, 2005: 89）。第二，它致力於數學符號的複雜操弄，從而使得政治研究成為「壞科學」（bad science）。Kasza（2001: 597）指出，由於硬科學家操弄複雜的數學符號，所以其研究結果的審查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在「自家人」身上，十分欠缺「外部的評審」。第三，它脫離真實的政治生活，從而不過問規範性的與實踐性的研究課題。Kasza（2001: 597）說：「就規範面而言，硬科學家忽視道德問題。他們逕將古典政治哲學遠推到『課程的邊緣』之處。就實踐面來說，硬科學家表面上似在處理經驗問題，但不可避免地墮落到非經驗性的數學練習。……真實的、活生生的人類政治行動，實在不易契合理性的選擇均衡或任何其他相當嚴密的理論公式。因此，發展硬科學之政治理論的唯一出路，便是隔絕經驗世界。」

鑑於這三大弊病，Kasza 諷刺說：「理性選擇理論家 William Riker 喜好把政治學比喻成一條沈船，而自詡理論選擇理論就是將它拖到港口的唯一拖船。事實上，Riker 及其門徒的行為，無異於將政治學

劫持到一個相當貧瘠的荒島上。因此，說其言行如同海盜，乃是一個較為真實的說法。」（Kasza, 2001: 599）。

為了糾正這種不當的「硬科學」，改造運動者提出「周全科學」（ecumenical science）的呼籲。改造運動者所謂的「周全科學」，乃是希望政治學者根據「問題驅策的研究」（problem-driven research）、「方法論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以及「科際研究」等三項原則，而來進行政治研究。為了具體實現這三項原則，改造運動者分別在專業組織、專業期刊、課程設計、以及研究生的方法論訓練等層面上，提出下述七項的具體建議（Kasza, 2001: 598-599）：

- （1）必須恢復政治哲學在政治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以致於使得政治生活的目標，再度成為我們共同關注的焦點。在現行的課程安排上，硬科學的方法論，竟然取代政治哲學而成為研究生的核心課程。這樣的課程安排，非但沒有增加我們的政治知識，反而導致一種狹隘的「科學觀」。在這種狹隘的「科學觀」之下，研究數量雖然增多，但其研究目的，總在於某種方法或研究法的「測試」（test-drive），而不在於提高我們的政治知識（無庸置疑的，大學生的註冊人數，已經隨著硬科學的獨霸而同步暴跌）。政治哲學的復興，將使我們環繞著共同的規範論述而結合在一起，並且方法論將會再次變成我們的研究手段，而非研究目的。
- （2）我們需將方法論的訓練，擴展到演繹理論與量化研究之外，以便包含質性研究的方法。
- （3）我們必須追求各種的革新策略，從而環繞著實質問題去重組我們的研究。這可能包括教職員隨著題材（而非次領域

或臨時研究組織）去組成研究陣線。我們應將學科中之標準的次領域，視為行政上的權宜作法，而非看作「創造性的研究組織」的一個固有障礙。例如，在性別與政治、移民與民權、政治與基因等重要的重要的新穎題材上，要求研究者去組成一個「創造性的研究組織」。

- (4) 我們必須力圖挽回政策研究的式微趨勢，以期作為邁向「重新鼓舞『問題驅策的研究』」的一大步。假使政策研究繼續以一種方式（實踐經濟研究飛離經濟系的方式）移向各種公共行政學派，那麼將是政治學的一場災難。假使比較今日學界中經濟系與商學院的規模，那麼我們可以得知，那將社會科學化約到貧瘠的理論努力，顯然代價不小。
- (5) 必須改革我們的專業結社與專業期刊，以期強調政治的實質，並著重各種方法與研究法的兼容並蓄。在專業期刊上，最具聲望的《美國政治學評論》，需要加以改革。在專業結社上，必須促進婦女、少數族裔團體、外國學者、以及文藝教職員等的完全參與；對於我們希望孕育的「周全性」，所有這些人的完全參與，將有各種的特別貢獻。
- (6) 必須更新我們對於世界各個不同區域的研究旨趣。就經驗性的政治理論來說，跨文化的比較研究（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可能是理想的基準，但它不是「非文化的研究」（acultural research）。假使仿效經濟學去排斥國外的區域研究，那麼比較政治研究也就成為一件不可能之事了。在研究生的學程上，切勿容許統計課程取代外國語文。我們尤其需要提高教職員之非西方世界的專門知識。切勿容許「非西方的區域研究」隨著外在基金的消長而起伏不

定，以免返回政治研究的黑暗時代。在政治研究的黑暗時代中，所謂的「政治」，僅指少數富裕之西方國家的政治。

- (7) 我們必須推進科際研究；這不僅僅止於去吟詠科際研究的讚詞，而是需要透過教育下一代學者而來力行之。……我們必須推進研究生的訓練。在研究生的訓練上，不但需要促使政治學結合著其他人文社會科學，而且也需要促成政治學與物理學之間的結合。我們贊成「共同學位學程」的擴展，並鼓勵博士生去獲得其他學科的碩士學位。在「周全科學」的詞彙中，「科系」與「學科」將是最不被看重的兩個字彙了。我們贊成一門「非學科訓練的政治學」(an un-discipline-d political science)。

上述七項的具體建議，迅速獲得美國政治學界的一些回應，從而至少具有兩個具體成果。第一，政治社會史家 Theda Skocpol (1947-) 當選「美國政治學會」第九十八任會長 (2002-3)，而比較政治研究家 Susanne Rudolph 則當選「美國政治學會」第九十九任會長 (2003-4)。這兩位女性政治學家的連續榮任會長，廣被視為「對於改造運動的許多目標 (雖非全部目標) 的一種迴響，即使她們已經成為美國政治學會之既有體制或權力結構的領導人物」(Monroe, 2005: 5)。第二，「美國政治學會」於 2003 年另外創立一份學術期刊《政治見解》(*Perspectives on Politics*)。¹¹ 依據

11. 一位反對行為主義的政治學者 C. W. Harrington 也曾在 1966 年基於「厭惡數學符號的操弄」，致函《美國政治學評論》的編輯，建議編輯委員會將《美國政治學評論》分成兩種期刊：其中之一是《美國電腦玩家評論》，另外之一則是維持原有的《美國政治學評論》。Harrington 說：「在貴刊九月份刊登的各篇文章中，除了一篇文章外，其餘文章好像都是電腦所寫……充滿著稀奇古怪的希臘字母、數學符號、以及各色各樣的黑話。本人是否可做一個或許已算太遲的建議？本人建議，以後的《美國政治學評論》可以分成兩種期刊發行。其中一種刊登那些探討政治學的文章，繼續稱做《美國政治學評論》，另外一種則專

該期刊主編Jennifer Hochschild的說明，《政治見解》所要刊載的文章，旨在澄清區域研究、政策研究、規範衝突研究、重要制度研究、重要過程研究等的政治意義（political significance），並且彰顯各種政治評估中潛藏的種種洞見，因而各篇文章必須運用「最少的專門術語」來清楚撰寫（Hochschild, 2003: 1）。不過，這兩項的具體成果，雖然難能可貴，但在致知議題上卻屬枝節瑣事，甚至被視為「可能是轉移焦點的一些伎倆」（Lowi, 2005: 51）。

無庸諱言的，除了這些枝枝節節的具體成果之外，「改造運動」所提出的七項具體建議，大部分屬於「新瓶裝舊酒」的主張。例如，第（7）項的「我們必須推進科際研究」，就是行為主義之八大信條中的第（7）項信條（「政治學家必須更為『科際性』」）的舊調重彈。再如，第（3）項的「環繞著實質問題去重組我們的研究」與第（4）項的「力圖挽回政策研究的式微趨勢，以期邁向『問題驅策的研究』」，則是後行為主義之七大信條中的第（1）項信條（「實質優先於技術」）的翻版，同時多多少少也反映出後行為主義之第（5）、（6）、（7）項信條（「知識份子的歷史角色、責任、以及義務等」）的主張。又如，第（1）項的「必須恢復政治哲學在政治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也類似後行為主義之七大信條中的第（4）項信條（「價值的研究及其建構發展，乃是政治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¹² 至於第（2）項的「我們需將方法論的訓練，擴展到演繹理論與量化研究之外，以便包含質性研究的方法」，則是無人會加以公開反對的一個箴言。

門刊載貴刊九月份那類的文章，而之稱為《美國電腦玩家評論》。」（cited by McCoy and Playford, 1967: 8, note17）。然而，Harrington的建議，在當時未被採納。

12. 關於行為主義的八大信條與後行為主義的七大信條，詳見郭秋永（2002：486-488；499-500）。

據此而言，「改造運動」雖然極力排斥「操弄數學符號的硬科學」，但實際上並未針對行為主義以降的「科學化主張」，進行有系統的批判，或者，並未在霸權者的「科學化主張」之外，提出可供選擇的另外一種「科學主張」。或許，就是基於這個緣故，Peter Steinberger（2005）方才提出下述四點甚為尖銳的批判。第一，改造運動者倡議的制度改革，令人困擾不已。因為他們竟然針對「學術性的與科學性的」問題，提出一些「政治性的」解決方案。第二，他們對於統計分析之無效力的、不相干的指責，絲毫不具說服力。第三，政治學界內存在著霸權的指控，乃是無的放矢。第四，「質」與「量」之間的區分，乃是誇大之詞。

誠然，「改造運動」乃是一個方興未艾的運動，目前就去論斷其成敗或功過，或許言之過早。然而，除了專業組織、專業期刊、以及課程設計等的制度改造之外，我們或許可以憑藉長久以來的兩大學術潮流，進一步詮釋它的重要蘊含。下文專就「學術性的科學問題」，分從「規範轉向」以及「質量並重」兩個層面，進一步論述「改造運動」的重要意涵。

四、規範轉向

著名學者 Peter Laslett（1915-2001）曾在 1956 年傷感地指出：「無論如何，就目前而言，政治哲學已經壽終正寢。」（Laslett, 1956: vii）行為主義健將 Robert Dahl（1915-）則在 1958 年愉悅地指出，政治哲學「在英語系國家中已經死亡，在共產國家中業被監禁，而在別處則氣息奄奄。」（Dahl, 1958: 89）。然而，七十年代以後，政治哲學的研究趨勢，逐漸翻轉，終至煥然一新。不但獻身於政治

哲學研究的人才輩出，而且有關政治哲學的學術期刊、專著、叢書、及學術交流等，皆在穩定成長。時至八、九十年代，有些學者甚至聲稱，「政治哲學的研究，已經蔚為風尚」（Ceaser, 1990: 114; Richter, 1980: 13-15）。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已經蔚為風尚」，為何改造運動者還要高聲呼籲「恢復政治哲學在政治研究中固有的核心地位」呢？

誠然，對於這個基本問題，我們原則上可以提出幾個可能答案。例如，八、九十年代政治哲學「蔚為風尚」的研究盛況，也許只是一個自我稱許的勉勵之詞，而非名符其實的客觀描述。或者，政治哲學雖在八、九十年代蔚為風尚，但現在已經風華不再，從而退居次要地位。或者，八、九十年代政治哲學的研究盛況，僅是曇花一現的短暫現象，早已灰飛湮滅而消逝無蹤了。誠然，對改造運動者來說，儘管無法判定這些可能答案的正確性，但是政治哲學已被排除在核心地位之外，則屬千真萬確之事，因而才有「恢復」的高聲呼籲。

然而，從上述七項具體建議中的第（1）個項目看來，改造運動者並未建構出一套恢復「固有核心地位」的理論性論述，僅是針對大學的「課程安排」，提出一個具體建議，從而指出一個可能成效。這個具體的建議就是，我們應將訓練研究生的核心課程，從現行的「硬科學的方法論」，改成「政治哲學」。依據改造運動者的見解，這樣的課程轉變，可以達成「所有政治研究者環繞著共同的規範論述而結合在一起」的成效。十分可惜，核心課程的這種轉變及其可能帶來的成效，並未建立在一套理論性的論述之上，從而凸顯出改造力道的單薄。不過，在討論這種理論性的論述上，我們或許可從一個呼應「改造運動」的視角，來作進一步的評述。這個呼應「改

造運動」的視角，就是力主政治研究轉向政治哲學之「規範轉向」(normative turn)的角度。

二十世紀末葉，政治研究上反對「科學化主張」的力道，隨著美國社會科學上的各種「轉向」議題，而日益增強。依據 Yanow and Schwartz-Shea (2006: xi-xiii) 的列舉，在這個時期中，美國社會科學上的「轉向議題」，包括「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敘述轉向」(narrative turn)、「隱喻轉向」(metaphorical turn)、「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歷史轉向」(historic turn)、「論證轉向」(argumentative turn)、「修辭轉向」(rhetorical turn)、「實踐轉向」(practice turn)等。時至二十一世紀，這些「轉向」議題，在美國政治學上結合著「規範轉向」(Gerring and Yesnowitz, 2006)。

如同改造運動者，呼籲「規範轉向」的政治學者，也十分不滿政治研究的現況。John Gerring 與 Joshua Yesnowitz 兩位政治學者指出，一種重視實質問題而比較令人滿意的政治研究，或一門「相干而有用的」政治學，必須包含三種議題。第一，所在研究的題材，是否具有相干性呢？亦即，所在研究的題材，是否就是眾所關心而影響深遠的題材呢？第二，研究者如何在經驗上證明其主要的研究假定呢？第三，不同視角如何改變政策的「好壞觀念」呢？這兩位政治學者進一步指出，對於上述三種不可或缺的議題，當前的政治研究，竟然掉以輕心，從而顯露出「不相干」、「不驗證」、「不推敲」等三種特徵。

首先，檢視當代政治研究的「不相干」特徵。Gerring 與 Yesnowitz 指出，在當代的政治研究領域中，無關緊要的著作，為數甚為可觀。這些為數可觀但無足輕重的著作，不但包含經驗性的研究，而且包

括政治哲學的研究。為數眾多的經驗性研究，「在方法論上可能十分精巧、在宣稱上可能機率地為真、在某一理論架構內可能富有意義、在既有經驗問題中可能意義非凡。然而，在公共政策上或在一般公民關注之處，它們缺乏明顯的意義。」（Gerring and Yesnowitz, 2006: 104）事實上，這種風馬牛不相干的研究特徵，不但呈現在經驗性的政治研究中，而且顯現在哲學性的政治研究上。這兩位政治學者指出，當今為數不少的政治哲學研究，「僅是注意古典政治哲學家曾經說過什麼或在說些什麼，而將『去做什麼才是好的（good）』之規範性的理論工作，放逐到邊緣之處」，因而也欠缺相干性（Gerring and Yesnowitz, 2006: 105）。

其次，檢視當代政治研究的「不驗證」特徵。Gerring 與 Yesnowitz 指出，許多經驗性的研究，通常奠基在一些重要的假定之上。這些重要的假定，雖然應被明確驗證，但卻常被當作「不證自明」的前提，從而大大減損經驗研究的相干性質。例如，有關聯邦主義的多數研究，通常假定「對民主政治而言，聯邦主義是好的（good）」，但研究者甚少以一種可以否證的明確形式來表明它，遑論訴諸任何的經驗檢定了。再如，有關社會資本、市民社會、自願結社、參與民主等的研究，時常假定豐沛的社會資本、活絡的市民社會、蓬勃的自願結社、積極的參與民主等，乃是彌足珍貴而值得推薦的社會現象，但卻很少訴諸經驗檢定。又如，一般的政黨研究，通常假定「對治理來說，強而有力的政黨，乃是好的（good）」，但當需要提供經驗證明時，研究者卻常沈默不語（Gerring and Yesnowitz, 2006: 106）。

最後，檢視當代政治研究的「不推敲」特徵。Gerring 與 Yesnowitz 指出，研究者通常會對其研究發現，賦予某一規範性的結論，但很

少會從不同視角，來進行此種規範性結論之「好壞」的推敲。例如，在論斷某一「不平等的」政策（或制度）是否合乎公道上，基本上至少計有三個原則：差異原則、功效原則、以及權利原則。依據差異原則，一個損害到社會中處於最不利地位者的政策，乃是不公道的政策。根據功效原則，一個損害到社會中最大多數人的政策，乃是不公道的政策。按照權利原則，一個違反基本人權的政策，乃是不公道的政策。然而，在將某一規範意涵賦予其研究發現上，研究者通常僅是依據某一特定原則（例如功效原則）來辯護某一「不平等的」政策，而不會進一步推敲其他原則（例如差異原則與權利原則）的規範意涵。因此，這兩位政治學者說：「正如計量經濟學已被指控為站立在搖擺不定的高蹺上，涵蓋更加廣泛領域的社會科學，可能會被指控為站立在搖擺不定的規範性高蹺上。我們信心滿滿提到一些『理想』，例如民主、平等、不歧視、功效等，但這些『理想』究竟意指什麼呢？並且相對於其他規範性目標以及它們彼此之間，這些『理想』的相對重要性，又是如何呢？...顯而易見的，規範理論必須處理事實，正如經驗研究必須處理價值一樣；兩者並非座落在不同世界之中。經驗理論與規範理論之間的學科分離，不但造成重大損害，而且也是不誠實的分割。因為它們各自依賴在彼此之間的理解之上」（Gerring and Yesnowitz, 2006: 108）。

從上述「不相干」、「不驗證」、以及「不推敲」等當代政治研究特徵的仔細檢視，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其所謂的「相干而有用的政治學」，必須同時包含經驗性與規範性兩種研究。然而，究竟如何「同時包含」這兩種研究呢？或者，究竟如何「整合」經驗性研究與規範性研究呢？

事實上，呼籲「規範轉向」的政治學者，僅僅止於諸如「要將

經驗性的科學研究，牢牢地拴在規範性的研究上」之類的宣示，而未提出具體的「整合」步驟。他們說：「去如此做的最佳方式，不是放棄科學，而是要將科學拴在規範關懷上...我們的立場是，經驗研究雖然有別於道德研究，但這兩者必然相互關連在一起...誠然，政治學中的規範轉向，大部分依賴在經驗研究上。記住，我們所在要求的，不是去排斥『實證科學』，而是將它應用到規範上珍視的題材、將它應用到政治...良好的社會科學，必須整合兩種元素；它必須在經驗上有憑有據，並且它必須相干於人類關懷」(Gerring and Yesnowitz, 2006: 114、119、130、133)。

那麼，究竟如何整合「政治哲學」與「實證科學」呢？雖然改造運動者與規範轉向者都存而不論，但是我們或許可從規範轉向者之「兩者並非座落在不同世界」的原則性宣示，以及學界人士耳熟能詳的「科際整合」，獲得一些啟發性的見解。

依據筆者的淺見，社會科學的研究旨趣，雖然隨著不同學科而略有差異，但基本上都是環繞著「人及其行為」。換句話說，社會科學中的不同學科，採取不盡相同的理論建構、研究法、方法、以及專門術語等，分就「人及其行為」的不同層面，各自進行深入的鑽研工。這種學術的分工或專門化，雖然促進各個學科的縱向深度，從而造就了術業有專攻的學者，但也易於斷喪橫向的擴展，進而導致劃地自限的心態，甚至造成隔行如隔山的窘境，終而妨礙「人及其行為」的通盤理解。有鑑於此，「科際整合」的呼籲，也就此起彼落，不絕於耳了。然而，什麼是「科際整合」呢？

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行為主義健將 David Easton 就曾指出，學界人士大體上分從應用的層次、學程設計的層次、人員訓練的層次、以及分析單元的層次等，而來提倡「科際整合」。在應用

的層次上，所謂的「科際整合」乃指，為了解決社會的某種整體性問題，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組成一個研究團隊，從而針對該一社會整體性的問題，各自提出分析結果，進而結合各個分析結果，共同討論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Easton (1965: 14) 說：「專家團隊為了實踐目的而一起工作，提供了一種的科際整合方式。」在學程設計的層次上，所謂的「科際整合」乃指，透過特定學程的研究訓練，促使研究人員學得相干而適當的任何知識與分析方式，以期突破單一的學科思維，進而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Easton (1965: 14) 說：「在這種學程中，單一學科的正式名稱，乃是不得提起的禁忌話題。」在人員訓練的層次上，所謂的「科際整合」乃指，一個研究生接受兩個或三個學科的訓練，從而使得不同學科「整合在單一個體」上。因此，單一學科的正式名稱，不是一個不得提起的禁忌。Easton (1965: 14) 說：「此處，訓練是學科性的，但訓練結果則是兩個或三個學科的整合。」在分析單元的層次上，所謂的「科際整合」乃指，人類行為中具有某種根本的分析單元，從而可以發展出某些共同的行為通則，藉以建立基本的、共同的社會理論。例如「行動」、「決策」、「選擇」、「系統」、「功能」等，也許能為「宏觀理論」(macrotheory) 或「微觀理論」(microtheory)，提供一個適於各個不同學科的、基本的、共同的分析單元。Easton (1965: 15) 說：「共同的分析單元，易於契合每一學科的特殊題材。在理想上，共同的分析單元，乃是可以重複的、無所不在的、分子式的……在這種方式之下，它們構成一切社會行為所賴以形成的分子，從而透過不同的制度、結構、以及過程而表現出來。」

從上述四種「科際整合」的具體方式，以及政治哲學與實證科學「兩者並非座落在不同世界」的提示，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一個簡

易可行的整合程序。

首先，身為一位政治研究者，我們當然受過「政治哲學」與「硬科學的方法論」的兩種訓練，從而足以落實「兩者並非座落在不同世界」的原則性宣示。其次，從分析單元的整合提示，我們或許可以提出另外一個具體的整合方式。這個另外可行的簡易整合方式，就是「相同的研究題材」的整合。例如，「公民身份」(citizenship)這一研究題材。在當今的政治哲學的研究領域上，「公民身份」的概念，不但密切關連著自由主義的個人權利觀念，而且緊密關係到社群主義的社群觀念，從而成為一個眾所矚目的核心課題(Kymlicka, 2002: 284)。在當今的實證科學(經驗主義)的政治研究領域上，「公民身份」的研究，一直在環保、社會福利、低政治參與率、低民主態度、少數族裔團體、獨立運動、移民、歐洲聯盟、以及全球化等議題的推波助瀾之下，成為大規模的全國性與國際性的調查研究課題(Heisler, 2005; Pattie et al, 2004)。因此，為了通盤理解「公民身份」及其理論建構，政治學者可以憑藉規範性與實證性兩種研究領域內既有的研究成果，解析「公民身份」的概念製作與測量項目，進而提出一個廣全性的經驗理論或規範理論。再次，不論在應用的層次、或在學程設計的層次、還是在人員訓練的層次，我們都可透過研究團隊或個人訓練的方式，針對「相同的研究題材」，進行整合研究。¹³

13. 有關「公民身份」的具體整合研究，參見郭秋永(2009)。

五、質量並重

改造運動者既然齊聲反對「操弄數學符號而漠視實質內涵」的美國政治研究現況，那麼對於蔚為風氣的「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或譯為「量的研究」)，當然抱持十分強烈的質疑態度。因此，他們一方面提出「問題驅策的研究」，企圖取代所謂的「方法驅策的研究」(method-driven research)，另一方面則主張「方法論的多元主義」，試圖指明「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或譯為「質的研究」)不是互斥的兩種研究，或者，「量化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或譯為「量的方法」)與「質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或譯為「質的方法」)不是互斥的兩種方法。¹⁴

「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不是互斥的兩種研究嗎？或者，「量的方法」與「質的方法」不是互斥的兩種方法嗎？假使不是，那麼它們之間究竟呈現出何種關係？顯而易見的，這種問題涉及政治研究上爭論不休的一些難題。為了耙梳其中的重重糾纏，我們首先必須針對一些最基本的觀念，例如「質」(quality)、「量」(quantity，或譯為「數量」)、「數」(number，或譯為「數字」)、測量(measurement)、「量的方法」、「質的方法」、「量化研究」、「質性研究」等，進行一些澄清工作。

「質」是指某種事物(或某種人)有別於其他事物(或其他人)

14. 有些學者將「方法驅策的研究」，稱為「方法崇拜」(methodolatry) (Punch, 1998: 5、21)。「方法崇拜」一詞，是由「方法」(method)與「盲目崇拜」(idolatry)兩個單字所組成，用來描述那些著重方法而不顧實質問題的研究，或用來描述那些硬以實質問題來配合方法的研究。

的屬性 (attribute)。我們能夠分辨某種事物 (或某種人) 的差別，端在於其「質」的差異。任何事物 (或任何人) 之「質」中所含的屬性，可以說是「不可勝數」。當我們將兩種事物 (或兩種人) 描述為「相同」之時，乃指這兩種事物 (或這兩種人) 在某一特定屬性或某些特定屬性上「近乎一樣」。大體而言，「近乎一樣」的程度，可以透過「數」來表示。「數」屬於分析命題中的抽象概念，並不指涉經驗世界，例如「3」本身，並不指涉經驗世界。當經驗世界中某種事物 (或某種人) 的屬性，例如「可吃的」(或「可敬的」)，結合著「數」之時，例如結合著「3」，便構成了某事物的「量」(或「數量」)，從而指涉經驗世界中特定的經驗訊息 (empirical information)，例如「3種可吃的食物」或「3個可敬的人物」。因此，「量」不是事物 (或人物) 本身固有的屬性，而是事物 (或人物) 之「質」的延伸 (Golembiewski et al., 1969: 439)。¹⁵

所謂「經驗世界中特定的經驗訊息」，就是一般所說的經驗材料 (empirical material) 或資料 (data)。當然，有關經驗世界中特定的經驗訊息 (或經驗材料或資料)，未必都是運用「數字」來表

15. 基於這個思維，「量化」(quantification) 是一件言之成理之事，而「質化」則稍嫌彆扭。誠然，我們可將已經「量化」的資料，轉成「質的資料」。這就是說，我們可以針對「量的資料」，進行「質化」的轉換過程，而使「量的資料」轉成「質的資料」。然而，自量化研究者看來，在進行統計分析或數學運算上，「量的資料」遠遠優於「質的資料」。因此，除非萬不得已，他們不會進行這種轉換，亦即不會進行「質化」的轉換程序。進一步說，「qualitative research」這一術語中的「qualitative」，僅有「質的」而無「質化」的意思。因此，「qualitative research」這一術語似乎不宜翻譯成「質化研究」，儘管「質化研究」乃是台灣學術界中最常用的一個譯名。同樣的道理，「qualitative data」也不宜翻譯成「質化資料」。不過，「quantitative research」這一術語中的「quantitative」，雖然也是僅有「量的」而無「量化」的意思，但是「量化研究」或「量化」的中文譯名，似可把握「量是質的延伸」的基本觀念，因而本文沿用台灣學界的翻譯習慣，也使用「量化」與「量化研究」的中文譯名。

達。當資料是用數字形式來表達時，稱為「量的資料」(quantitative data)；反之，則稱為「質的資料」(qualitative data)。因此，在一般教科書中，「量的資料」的界說，便是「數字形式的經驗訊息」；而「質的資料」的界說，則為「不是數字形式的經驗訊息」(Punch, 1998: 59)。

誠然，「量的資料」，不是「自然而有的」或「上天賜予的」，而是「人為的」。這就是說，那將數字加諸資料的，乃是研究者。因此，所謂的「測量」，就是「研究者按照一套特定規則，而將數字指派到事物、人物、事件、或任何東西」(Punch, 1998: 58)。然而，「測量」雖指研究者將資料轉成數字的過程，但轉化而成的「數字」，卻未必都是適合於加、減、乘、除的運算。因此，在一般教科書中，便依據轉換而成的「數字」是否適於加、減、乘、除，而將「測量」分成四種尺度(scale)：類別尺度(nominal scale)、順序尺度(ordinal scale)、等距尺度(interval scale)、等比尺度(ratio scale)。¹⁶

16. 類別尺度乃指分類，也就是研究者根據觀察對象的屬性，而將之歸入不同的類別中。例如「男」與「女」的性別分類。在量化研究中，諸如「男」與「女」之類的類別尺度，常被轉成「1」與「0」，裨益於進行統計分析。順序尺度不同於類別尺度之處，端在於其各個類別之間的屬性，具有程度上的差別，從而可以做出一個等第性的排列(例如1, 2, 3, …的排列)。賽跑名次就是一種順序尺度。我們雖然難以斷定其先後順序之間的精確差距(亦即不易斷定第一、第二、第三名之間的精確差距)，但是可以看出其先後順序。從數學觀點看來，類別尺度與順序尺度中所標示的「數字」，不能運用加、減、乘、除的算術運算。例如，不能將代表「男」與「女」的「1」與「0」，或不能將表示名次的「1」、「2」、「3」等，進行加、減、乘、除的算術運算。等距尺度不同於順序尺度之處，就在於其各個類別之間的屬性差別程度，不但可以等第排列，並且具有精確的距離。智力測驗所得的智商，就是一種等距尺度：智商「50分」恰在智商「60分」與智商「40分」之間，或者「 $60 - 50 = 50 - 40$ 」。可是，等距尺度並無「真正的零點」。例如張三在某次智力測驗中得到「0分」，不能就說張三毫無智力。等比尺度不同於等距尺度之處，端在於它具有「真正的零點」，從而可以表示出「倍數」的屬性差別程度。例如重量就是一種等比尺度。我

值得注意的是，「量的資料」既然出自人為，那麼研究者在將數字加諸於資料時，或研究者在將事物屬性轉換成為數字時，是否就會喪失了事物中某些重要的「質」呢？經驗主義與闡釋主義之間的一個關鍵性爭議，就在於社會資料是否適於「量化」（quantification）的議題，也就是社會資料中的「質」是否適於轉換成為數字的議題。換句話說，所在爭議的對象，不是「量化方法」（或統計方法）本身的優劣，而是「量化方法」是否適於處理並分析「質的資料」。

我們或許可以使用上述四種測量尺度中最單純的「類別尺度」，略加說明其中的爭議所在。所謂的類別尺度，實際上就是「分類」，例如包含「白領階級」與「藍領階級」的階級分類。在資料的分析上，經驗主義者通常運用數字「0」與「1」來代表這種類別尺度，從而進行必要的統計分析。那麼，在「0」與「1」的數字轉換過程中，「白領階級」與「藍領階級」的社會意義，是否就會喪失殆盡呢？經驗主義者提出「不會」的答案。¹⁷ 有些極端的經驗主義者甚至宣稱：「每一事物不是『1』就是『0』，毫無『質的資料』這種事物」（cited by Read and Marsh, 2002: 236）。闡釋主義者則提出「會」的答案。有些極端的闡釋主義者甚至聲稱量化研究只不過是GIGO（garbage in garbage out）式的研究：將扭曲變形的、如同垃

們可說體重 100 公斤是體重 50 公斤的兩倍重（ $100 = 2 \times 50$ ），但不可說智商 100 分是智商 50 分的兩倍聰明。

17. 此處僅以類別尺度說明經驗主義的「量化」立場，因此經驗主義者可以明確提出「不會」的答案。然而，當涉及「順序尺度」（或「等距尺度」或「等比尺度」）時，在將質資料轉化成量資料之際，例如在將「政治興趣」這一個概念、轉成「政治興趣量表四道問卷項目的得分」時，原先概念（「例如「政治興趣」）的社會意義，未必等於已被量化概念（例如「政治興趣四個問卷項目的得分」）的意義。因此，當涉及「順序尺度」以上的測量時，經驗主義者不會斬釘截鐵地提出「不會」答案，而會致力於強化原先概念與已被量化概念之間的密切關係。

圾的、錯誤的「量的資料」，投入電腦中進行套裝的統計分析，所得出的結果，仍然是扭曲變形的、如同垃圾的、錯誤的「量的結果」（cited by Miller, 1995: 166）。

提出「會」答案的闡釋主義者，致力於「質的資料」的細緻分析，當然不願將其資料進行「量化」的數字轉換。因此，闡釋主義者的研究，常被稱為「質性研究」，而其所採用的方法，則被稱為「質的方法」或「質性方法」。提出「不會」答案的經驗主義者，專注於「質的資料」的量化轉換，以期進行統計分析或數學演算。因此，經驗主義者的研究，常被稱為「量化研究」，而其所採用的方法，則被稱為「量的方法」或「量化方法」。在一般的教科書中，常將兩者之間的差異，對照表列如下：

表一 「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對照表

量化研究	質性研究
使用標準化的抽樣方法、訪問方法	使用沒有標準化的參與觀察法、深度訪問法、焦點團體法
運用統計分析	運用敘述分析
在蒐集所有資料之後才開始進行分析	在蒐集所有資料之前就已開始進行分析
使用大量資料	使用少數個案
植基在經驗主義	植基在闡釋主義
旨在建立定律以便進行科學解釋與科學預測	旨在詮釋行動意義以期進行理解工作
進行假設檢定	創造新的概念或理論

資料來源：摘自 Pierce(2008: 178)，但也參考 McNabb(2005: 342-356)、Read and Marsh(2002)、以及 Devine(2002)的敘述，而略加增減調整。

在這樣的對照表列之下，通常引起一些相互指控的尖銳批評（Miller, 1995: 166-170; Devine, 2002: 204-207），從而造成兩者之間存有一個不能跨越的鴻溝意象。

然而，近幾年以來，這種鴻溝式的截然二分，逐漸受到質疑。詮釋「質性方法」的政治學者Fiona Devine指出：「在實際上，社會科學家逐漸混和使用質性方法與量化方法」（Devine, 2002: 202）。詮釋「量化方法」的政治學者William Miller也說：「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之間的差異，基本上只是樣本大小與樣本代表性而已」（Miller, 1995: 169）。詮釋「量化方法與質性方法之結合」的兩位政治學者Melvyn Read與David Marsh則指出，當今多數的經驗研究者都承認，「量化方法」與「質性方法」兩者各有其效用；固守其中一種方法，無異於自我設限，兩種方法的結合使用，則效果非凡（Read and Marsh, 2002: 231）。教育心理學家John Creswell更具體提出「量化方法」與「質性方法」的三種結合型式的研究設計：兩階段型式、主從型式、混和型式（Creswell, 1994: 177）。¹⁸ 兩階段型式的研究設計，是指研究者在一個經驗研究中，先行採取量化方法（或質性方法）、然後再採取質性方法（或量化方法）的研究設計。主從型式的研究設計，是指研究者在一個經驗研究中，大部分上採取量化方法（或質性方法）、小部分採取質性方法（或量化方法）的研究設計。混和型式的研究設計，則指研究者在一個經驗研究中混和使用量化方法與質性方法。

如此說來，「量的方法」與「質的方法」之間的區分，是否就

18. Creswell 所謂三種型式的英文術語分別如下：「two-phase design approach」、「dominant-less dominant design」、「mixed-methodology design」。由於這三個英文術語實在不易直接翻成中文，以及 Creswell 交互使用「approach」與「design」兩個字彙而不加以區別，因而此處所謂之「兩階段型式」、「主從型式」、及「混和型式」，皆屬意譯而非直譯。

是一個「虛假的二分」(false dichotomy)，從而使得雙方的爭論，「淪為膚淺的無謂辯論」呢(John, 2002: 216)？當然，「兩者之間的區分，確有啟發性的作用，但不應誇大兩者之間的差異」之類的答案，乃是四平八穩的言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Read 與 Marsh 這兩位政治學者雖然聲稱「實際研究情況的證據顯示出，量化方法與質性方法之間的傳統哲學區分，逐漸被人看成一種虛假的區分」，但是仍然高度質疑兩種方法的結合型式，尤其是 Creswell 提出的「兩階段型式」與「混和型式」(Read and Marsh, 2002: 235, 241)。其所質疑的憑據，除了一些技術性的細節問題外，端在於經驗主義與闡釋主義之間的根本差異。依據他們的見解，經驗主義的研究旨趣，乃在於發現各種具有普遍效力的「科學定律」，從而特別著重「可重複性」與「可通則化」，因此密切連結著量化方法；而闡釋主義的研究旨趣，則在於詮釋社會行動中潛藏的重要意義，從而特別重視「相干性」，因此密切連結著質性方法。這兩位政治學者鄭重指出：

我們不可能在蒐集並分析量化資料時是一位實證主義者，而在分析質性資料時則轉而成為一位非實證主義者……所有的研究者必須嚴肅看待本體論與認識論的議題。對許多研究者來說，這意指方法的結合，只能在一種認識論之內進行。可是，我們見解中最為重要的論點是，當可能分辨「好的」與「壞的」研究之時，「好」與「壞」的判斷標準，將會隨著不同的方法或不同的結合方法而發生變動……例如，從事量化研究的實證主義者，將會基於研究結果的可重複性與可通則化，而來做「好」與「壞」的判斷。實證主義者的這種「好壞」的判斷標準，不相干於或少相干於相對主義者。相對主義者從事質性分析，並承認相同資料會有互相競爭的不同詮釋。不主張社會科學僅有一種研究方法，以及不主張我們可以建立起單一的一套判斷標準去判斷『好的研究』，乃是十分重要之事(Read and Marsh, 2002: 241、247-248)。

似乎有點弔詭，在這樣的主張之下，言之鑿鑿的「虛假的二分」，好像又再回復到有憑有據的「真實的二分」。那麼，「量化方法」與「質性方法」之間的區別，究竟是「虛假的二分」，還是「真實的二分」呢？對於這個根本問題，改造運動者至今依然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雖然他們一直強調研究生必須同時接受兩種方法的訓練。依據筆者的淺見，我們可以分從闡釋主義與經驗主義兩個立場，來答覆這個根本問題。

首先，根據闡釋主義者的見解，一般所謂的「非量化研究」（non-quantitative research），實際上包含「經驗主義的質性研究」與「傳統的質性研究」兩種。經驗主義的質性研究，僅指研究者將大樣本的研究方法，應用到個案研究或少數個案研究。傳統的質性研究，則首重於「行動意義」的理解，完全有別於經驗主義的質性研究。因此，「質性方法」與「量化方法」之間的二分，乃是不適當的分類，比較適當的區分，則是下述的三分方式：「經驗主義的質性方法」（或「實證主義的質性方法」）、「量化方法」、「傳統的質性方法」。¹⁹ 在這種三分之下，闡釋主義與經驗主義之間的差異，除了各種不同的分析方法之外，也顯現在最基本的「資料」見解。

依據闡釋主義的說法，「傳統的質性方法」的運用，首先在於「產生」資料，而「實證主義的質性方法」與「量化方法」的使用，則在於「收集」資料。闡釋主義者說：「『收集』資料乃是實驗室的語言。在這種語言中，蝴蝶、陶器碎片、或其他人造物品等，被物理地收集起來，帶回實驗室進行分析。然而，在人文科學所進行

19. Pushkala Prasad 曾將主張「實證主義的質性方法」的見解，稱為「質的實證主義」（qualitative positivism）（Prasad, 2005: 4）。

之非實驗室的田野研究中，原本的『資料』及其來源，仍然留在原處。被帶回的，乃是研究者的豐富訪問記錄、觀察記錄、文件摘要……『資料』不是所與事物（things given），而是觀察的、瞭解的、詮釋的事物。所在接近的，乃是資料的來源；資料本身是被產生的」（Yanow and Schwartz-Shea, 2006: xviii-xix）。

在闡釋主義的這種詮釋之下，改造運動所在要求的「方法論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就不是「任何事物皆可的多元主義」（“anything goes” pluralism），而是去確認「另外一種的科學研究方法」的正當性。換句話說，若將科學研究比喻為一座大廈、並把方法比喻為房間，那麼「科學大廈」內的「方法房間」，絕對不僅僅止於一間，而是所在多有。Dvora Yanow 指出：「改造運動不在要求『任何事物皆可』的多元主義，而是要求去確認一種以上的科學研究方式，當我們仍要保留『科學』這一語詞時。這個論證的蘊含是……在探討某些研究問題上，當發現到一些比起迴歸分析、路徑分析、理性選擇等更佳的其他方法時，我們便要運用這些更佳的其他方法。那麼，改造運動者並不企圖運用『質的方法』來整批取代『量的方法』，而是要求進一步擴展當代政治研究中具有正當性的方法領域，期能包含其他的、同樣也算是科學的方法」（Yanow, 2005: 201）。

其次，對於這兩種方法究竟是「虛假的二分」還是「真實的二分」的基本問題，經驗主義者可以透過「發現系絡」（context of discovery）與「驗證系絡」（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間的區別，來加以解決。

依據經驗主義的基本見解，科學活動可以區分為二：其一為發現系絡，另一為驗證系絡。這就是說，當研究者構成一個或一組可

以判定真偽的述句 (statement) 後，我們可以提出兩種不同的問題：(1) 如何想出這種述句？(2) 支持這種述句的理由是什麼？前一課題所涉及的範圍，乃屬「發現系絡」，基本上關切研究者如何獲得良好述句。後一課題所涵蓋的範圍，乃屬「驗證系絡」，主要上關切述句的保留或拒斥。

在「發現系絡」中，研究者如何獲得良好述句，幾無定則可尋；它可能來自上帝的啟示、或別人的沈思結晶、或個人的偶現靈感等等。在「驗證系絡」中，支持述句的理由，端在於經驗檢定與邏輯考驗。我們試以一件流傳已久的軼事，略加說明此種區別。據說十七、八世紀英國大科學家牛頓 (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某天坐在花園裡的一棵蘋果樹下，看到一個蘋果掉落地上，突然之間靈光一現，頓悟行星所以依循軌道、物體所以掉落地面、潮汐所以漲落等等，皆受萬有引力的支配。這是一件有關「發現」引力定律的迷人軼事，但卻跟該定律的「驗證」毫無關係。引力定律的成立與否 (或其真偽)，端在於經驗檢定與邏輯考驗，而不在於研究者本身的靈感或其他心理的、社會的、文化的、及天啟的條件等。

經驗主義區別這兩種系絡的主要目的，乃在將述句的產生活動或發現活動，排除在哲學研究範圍之外，從而將其注意焦點，集中在研究結果或理論成品的評估活動上。因此，經驗主義者能夠提出下述的答覆，而來規避「真假二分」的難題：研究者可在「發現系絡」內使用質性方法，而在「驗證系絡」中運用量化方法。

事實上，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行為主義健將 Robert Dahl (1915-) 研究美國 New Haven 城市的社群權力時，便是採用這種研究策略。Dahl 及其研究團隊將這個研究策略，稱為「兼容法」(eclectic methods)。他們所謂的「兼容法」，乃指研究者在兩個階段上，也

就是在「發現系絡」與「驗證系絡」中，分別使用質性方法與量化方法。在第一個研究階段上，也就是在「發現系絡」中，他們使用各種質性方法。例如，針對城中 50 位活躍人士進行深度訪談，指派一位研究者進駐市政府從事一年的參與觀察，以及閱讀歷史材料、文件、文獻。透過這些質性方法的運用，他們試圖想出適當的問卷題材、良好的問卷項目、以及各種相互關連的假設。在第二個階段上，也就是在「驗證系絡」中，他們則使用各種量化方法。例如，奠基在深度訪談、參與觀察、歷史文獻等所得到的資訊之上，他們便將「何人治理」的廣泛課題，分成「權力資源如何分配」、「重要決策如何制訂」、「公民如何運用政治資源」等等的特定議題，從而正式做成問卷題目、舉行了三次的調查訪問、進行了必要的統計分析，終而印證各個假設而獲得眾所矚目的「多元民主理論」(Dahl, 1961: vi、330; Polsby, 1980: 154-156)。

六、結語

「美國政治學會」第六十一任會長（1965-6）Gabriel Almond（1911-2002）曾經引用愛爾蘭一位劇作家的名劇《分桌》，描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政治學界的研究狀況（Almond, 1990: 13-31）。這個比喻或許稍嫌牽強，但稍做修改後，頗能彰顯本文的旨意。

《分桌》一劇，敘述一間二流旅館的餐廳中，一群過客分桌用餐的情況，藉以刻畫飲食男女的孤寂情懷。依據 Almond 的比喻，所有美國政治學者皆在進行政治研究；這如同一群過客都在一間餐廳中用餐。其中一些惹人側目的政治學者，按照意識型態與方法論上的懸殊性質，可以分成各行其是而不相往來的四大陣營，例如史

氏註釋派 (Straussian exegesis)、數學計量派、批判理論派、及新保守主義派；這如同一些光鮮亮麗的過客，分據四張光線聚集的外側餐桌，而各自埋頭進食。除了這四個互不聞問的陣營外，大多數的政治學者，懷抱著「自由而溫和」的意識型態，也採取「折衷而開放」的方法論，雖然不引人注目，但展現出相互借鏡的研究情況；這如同餐廳中間一長排自助餐的用餐者，各取所需後便陸續分坐在一些不起眼的、光線不足的、但可以更換餐伴的餐桌，從而在低聲交談中享用餐點。透過這個比喻，Almond 一方面感嘆美國政治研究的「氣氛與聲譽」，竟然大受「餐廳四側」少數極端派別的影響，而呈現出偏頗的研究意象 (1990: 16)，一方面則在另外一篇論文 (Almond, 1996) 中，提出一個所謂「進步而折衷」的見解，試圖凸顯「餐廳中間」大多數政治學者潛具的相似觀念。借用餐廳進食光景的這個比喻，或許可以圖像式地凸顯本文的基本旨意。

依據本文的解析，一百餘年來，美國政治學中正、反兩面的「科學化主張」，展現出兩種「家族」的兩種「家族類似性」。第一種的「家族」，旨在主張政治研究的「科學化」，而歷年來所宣揚的各種科學化主張，則呈現出不盡相同、但又不盡相異的「家族類似性」。第二種的「家族」，旨在反對科學化主張，而歷年來針對不同時期之科學化主張所分別提出的各種批判論述，也呈現出不盡相同、但又不盡相異的「家族類似性」。

假使歷年來的美國政治研究狀況，如同一間進食的餐廳，那麼，此一餐廳大體上分成兩大塊用餐區。傳承久遠的兩種「家族」，分別佔用不同用餐區而各自進食。兩種「家族」之互為消長的波動，如同餐廳中光線的明暗轉換。在特定時期中，當餐廳中的光線聚焦在某一用餐區塊時，表示其中某一「家族」的一些主張，蔚為風潮

而備受矚目，另外一種「家族」的主張，則黯淡無光而乏人問津。二十一世紀初葉的改造運動，屬於反科學化主張的「家族」。改造運動的風起雲湧，如同餐廳中的光線，聚焦在他們身上。

這個光鮮亮麗的改造運動，一方面力主「恢復政治哲學在政治研究中固有的核心地位」，從而隱含規範研究與實證研究之間的整合要求，一方面則提倡「量化方法」與「質性方法」的兼容並蓄，從而隱含「任何事物皆可的方法論多元主義」。然而，在前一議題上，改造運動者並未建構出一套理論性的論述，僅是針對「研究生的課程安排」提出一個建議而已。在後一議題上，改造運動者並未正視兩種方法的混和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前一議題，筆者奠基在前人的高見上，提出一個簡易可行的整合方式。這個簡易可行的整合方式，就是「相同的研究題材」的整合。關於後一議題，筆者分別指出闡釋主義與經驗主義的解決之道。就闡釋主義來說，我們應該運用「經驗主義的質性方法」、「量化方法」、以及「傳統的質性方法」的適當區別，來取代「量化方法」與「質性方法」之間的不當二分。在這樣的重新區別之下，改造運動所在要求的「方法論的多元主義」，就不是「任何事物皆可的多元主義」，而是去確認「另外一種的科學研究方法」的正當性。就經驗主義來說，「量化方法」與「質性方法」之間的「虛假二分」或「真實二分」的難題，可以透過「發現系絡」與「驗證系絡」之間的區別，來加以解決。這就是說，我們可以在「發現系絡」中運用「質性方法」，而在「驗證系絡」中使用「量化方法」。

參考書目

- Alker, Hayward. 1996. "Political Methodology, Old and New." in Robert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787-79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mond, Gabriel. 1990.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Almond, Gabriel. 1996. "Political Science: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in Robert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50-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lmond, Gabriel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 Bond, Jon R. 2007. "The Scientification of the Study of Politics: Some Observations on Behavioral 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9, 4: 897-907.
- Brady, Henry and David Collier. eds. 2004.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Brady, Henry E. et al. 2004. "Refocusing the Discussion of Methodology." 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3-20*.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Compbell, Angus et al.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 Ceaser, James. 1990. *Liberal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Scien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reswell, John. 1994.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Sage.
- Dahl, Robert. 1958. "Political Theory: Truth and Consequences." *World Politics* 11: 89-102.
- Dahl, Robert. 1961.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 Epitaph for a Monument to a Successful Protes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763-772.
- Devine, Fiona. 2002. "Qualitative Methods."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197-215. 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 Dryzek, John. 2005. "A Pox on Perestroika, a Hex on Hegemony." in Kristen Monroee. ed.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509-52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ryzek, John. 2006. "Revolutions without Enemies: Key Transform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 4: 487-492.
- Easton, David. 1965.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N. J.: Prentice-Hall.
- Easton, David. 1953.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Knopf.
- Easton, David. 1969. "The Current Meaning of Behavioralism." in James Charlesworth. e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1-31.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Easton, David. 1969. "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 4: 1051-1061.
- Easton, David. 1971.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2nd e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Easton, David. 1991.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Past and Present." in David Easton et al. ed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 Comparative Survey*: 275-29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ay, Brian and J. Donald Moon. 1994. "What Would an Adequat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Look Like?" in Michael Martin and Lee C. McIntyre. eds.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21-35.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Gerring, John and Joshua Yesnowitz. 2006. "A Normative Turn in Political Science." *Polity* 38: 101-133.
- Golembiewski, Robert et al. 1969. *A Methodological Primer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Chicago: Rand McNally.
- Heisler, Martin O. 2005. "Introduction-Changing Citizen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a Democratic Framework."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8, 4: 667-670.
- Hochschild, Jennifer. 2003. "Editor's Note: Introduction and Observat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 1: 1-4.
- Isaak, Alan. 1985. *Scope and Methods of Political Science*. 4th ed.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 John, Peter. 2002.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216-230. 2nd ed.

- New York: Palgrave.
- Kaplan, Abraham. 1964. *The Conduct of Inquiry: Methodology for Behavioral Science*. San Francisco: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 Kasza, Gregory. 2001. "Perestroika: for an Ecumenical Scie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4, 3: 597-599.
- Kaufman, Stuart. 2005. "Rational Choice, Symbolic Politics, and Pluralism in the Study of Violent Conflict." in Kristen Monoroe. ed.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87-10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err, Keith. 2008. "Social Sciences." in William A. Darity Jr.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614-618. 2nd ed. New York: Thomson Gale.
- King, Gary et al.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rkpatrick, Evron. 1962. "The Impact of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on Tradi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in Austin Ranny. ed. *Essays on the Behavioral Study of Politics*: 1-29.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Kymlicka, Will. 2002.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slett, Peter. 1956. "Introductio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Series 1: vii-xv. Oxford: Blackwell.
- Lowi, Theodore. 1985. "Foreword." in Raymond Seidelman and Edward Harpham. eds. *Disenchanted Realists: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American Crisis, 1884-1984*: 7-1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owi, Theodore. 2005. "Every Poet His Own Aristotle." in Kristen Monroee. ed.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45-5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cCoy, Charles and John Playford. 1967. "Introduction." in Charles McCoy and John Playford. eds. *Apolitical Politics: A Critique of Behavioralism*: 1-10.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 Mckeown, Timothy. 2004. "Case Studies and the Limits of the Quantitative Worldview." 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138-167.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McNabb, David. 2005. *Research Methods for Political Scienc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New York: M. E. Sharpe.
- Merriam, Charles. 1925. *New Aspects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ller, Eugene. 1972a. "Positivism, Historicism, and Political Inqui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 796-817.
- Miller, Eugene. 1972b. "Rejoinder to 'Comments' by David Braybrooke and Alexander Rosenberg, Richard Rudner, and Martin Landau."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 857-873.
- Miller, William. 1995. "Qualitative Methods."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154-172. New York: St. Martin's.
- Monroe, Kristen. 2005. "Introduction." in Kristen Monroe. ed.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1-5. New

-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oon, J. Donald. 1975. "The Logic of Political Inquiry: A Synthesis of Opposed Perspectives." in Fred Greenstein and Nelson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Science: Scope and Theory I*: 131-228. Mass.: Addition-Wesley.
- Moon, J. Donald. 1982. "Interpretation, Theory, and Human Emancipation." in Elinor Ostrom. ed.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Inquiry*: 149-178.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Munck, Gerardo. 2004. "Tool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105-121.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Pattie, Charles et al. 2004. *Citizenship in Britain: Values,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erce, Roger. 2008. *Research Methods in Politics*. London: Sage.
- Polsby, Nelson. 1980. *Community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 A Further Look at Problems of Evidence and Inference*. 2nd ed.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rasad, Pushkala. 2005. *Craf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Working in the Postpositivist Traditions*. New York: M. E. Sharpe.
- Punch, Keith. 1998. *Introduction to Social Researc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Sage.
- Read, Melvyn and David Marsh. 2002.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231-248. 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 Richter, Melvin. 1980. "Introduction." in Melvin Richter. ed.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3-56.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Rogers. 2005. "Of Means and Meaning: The Challenge of Doing Good Political Science." in Kristen Monroee. ed.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525-53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omit, Albert and Joseph Tanenhaus. 196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 Profile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 Somit, Albert and Joseph Tanenhaus. 1967.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 Steinberger, Peter. 2005. "Reforming the Discipline." in Kristen Monroee. ed.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548-56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oring, Herbert. ed., 1962. *Essays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Strauss, Leo. 1962. "Epilogue." in Herbert Storing. ed. *Essays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307-327.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 Truman, David B. 1951.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Knopf.
- Yanow, Dvora. 2005. "In the House of 'Science' There are Many Rooms." in Kristen Monroee. ed.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200-21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Yanow, Dvora and Peregrine Schwartz-Shea. 2006. "Introduction." in Dvora Yanow and Peregrine Schwartz-Shea. eds. *Interpretation and Metho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Interpretive Turn*: 11-27. New York: M. E. Sharpe.

郭仁孚。1973。〈美國政治學研究上的行為主義〉。《人與社會》3：72-88。

郭秋永。2002。〈邏輯實證論、行為主義及後行為主義：經驗性政治研究的理論基礎〉。《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4，4：465-514。

郭秋永。2009。〈公民意識：實證與規範之間的一個整合研究〉。張福建主編《公民意識與政治行動：實證與規範之間的對話》：41-94。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華力進。1980。《行為主義評介》。台北：經世書局。

Perestroika Movement: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Chiu-yeoung Kuo *

Perestroika movement is a still growing movement in today'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community. "Perestroika", the Russian name, reflected the two ideals central to the Perestroika movement: the commitment to restruc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desire to introduce new ideas and new participants into the political process. However, How to "restruc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How to "introduce new ideas and new participants into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viewpoint of Perestroikans, the means of realizing these two central ideals are rectifying the narrow parochialism and methodological bias toward the quantitative, mathematical, statistical, and formal modeling approach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restor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a central place in the political studies. Obviously, this viewpoint raised complex issues and a series of debates.

But many arguments of these debates have focused our attention on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such as APSA governance, publication in journals, and graduate education, not on the "intellectual reform".

*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seeks to set Perestroika mov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o show the important implication of its “intellectual reform”.

Key words: Perestroika movement, quant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methodology